

第四章 魯迅肉體生命意識的歷時性發展——「同仁背叛」的歷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

魯迅就像四書五經，可以一直研究下去。——唐翼明

文學就是永遠的陌生化；子曰四十而不惑，但文學家可能是四十而愈惑。——唐翼明

前言

本章要探討魯迅的肉體生命意識的「發展」，即其如何在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得到實現。由於肉身意識是對非語言、前語言的生活世界的感受，本章就把焦點放在魯迅一生中「破壞語言（因果）邏輯」的幾個重大事件上，經過這些「無以名之」的事件，魯迅對肉身的把握愈益深刻，使他批判國民性的武器也愈見銳利。這些事件依序是：弱冠前親人死亡的經驗，留日時期對死亡的「凝視」，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人際關係的劇變，以及三〇年代前後擁抱馬克思主義的痛苦。我們可把這四個階段表述成魯迅的三次脫離「認同系統」的「自我放逐」：留日時期他以「立人」為職志，是他自外於舊中國傳統的第一次放逐；二〇年代中期劇變後，是逃出新文化陣營的第二次放逐；三〇年代與左翼陣營內的論戰，則是跳出左翼主流文化論述的第三次放逐。這種自我初衷的破滅、自我的否定，與否定自己認定的敵人（如魯迅對『學衡』派、『現代評論』派、『新月』派，甚至『第三種人』的論戰）相較，對自我意識、語言邏輯掌控的「象徵界」的破壞力更大，這是本章選擇這些事件為焦點的原因。

第一節 矇昧時期的生命悸動

根據研究，七、八歲以後的孩子才會產生死亡意識，十歲以上的孩子則能充分瞭解醫學上的死亡就是肉體機能停止運作，也開始理解到自己也會遭遇死亡，進而開始思索自己的生死觀。而孩子感受到自己和死亡間的關聯時，也就是他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存在個體的時候，死亡之所以令人恐懼，正因死亡意味「這個、現在存在的有意識的自我」的消失。¹這種死亡意識由看到他人的死亡開其端，逐漸轉化成自

¹ 柳澤桂子，《生死書》，呂美汝譯，台北：究竟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 27-29。

己的感覺，這一過程兒童一般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²至於人對於死亡的恐怖感，則由「認識的人的死亡」啓其端，如果死者與自己的關係愈親近，對死亡的情緒反應會愈強烈。³

魯迅八歲時未滿週歲的妹妹端姑因天花逝世，十三歲時曾祖母病逝，十四歲時待他很好的小姑母病逝，十六歲時父親病逝。⁴這一連串親人的死亡，對魯迅的死亡意識的形成應有很大影響。小妹端姑病逝時，魯迅曾躲在屋角爲她哭泣；⁵這是魯迅第一次遭遇到親人死亡，但魯迅的反應卻反映他似已從本體論的高度感受到死亡意義的早熟。由於端姑未滿週歲即逝，魯迅對她的情感可能僅限於對嬰兒的憐愛，這種對初生嬰兒的情感是最本能的、直觀的「愛」，甚至不涉「親情」的社會成分；而端姑從出生到死亡所歷期程短暫，當使魯迅對「生命的短暫無常」有第一手的體驗；魯迅八歲便有這樣體驗的機會，無疑對他提早形成死亡意識、乃至勘破人生本質，有所助益。故魯迅之哭端姑，與其說是兄妹之情，不如說更是死亡意識的覺醒。

親人死亡的經驗中，對魯迅衝擊最大的無疑是父親伯宜公的死亡。魯迅對父親染病至死的過程印象深刻，在《吶喊·自序》及《朝花夕拾·父親的病》都有描述；但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在《父親的病》中記父親臨終時長輩衍太太要魯迅大聲叫喚，他一直叫到父親咽氣，⁶是不符事實的，當時不過「臨了也叫了兩聲，聽見他不答應，大家就哭起來了」，依習俗衍太太根本不在場。⁷本文認爲，魯迅的一再追憶甚至誇大父親的病與死的情節，至少反映至親的死使他留下深刻印象，尤其父親攔留跨越生死的那一幕，可能即已埋下他「犧牲經濟學」的種子，他在《父親的病》結束時說：「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當然我們可以把這負罪感詮釋成他日後學習西醫的動因，但這裡魯迅用的是「最大的錯處」，顯然要比中醫誤診的「錯」嚴重；何以是「最大」錯處？就因爲「臨終叫喚父親」的錯是在「生死之交」鑄成的，一旦鑄成就無法挽回，魯迅日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可能跨越生死兩界去補償這錯處，這裡「生」對「死」的對比就是「有限」對「無限」的對比，魯迅當已經感到兩者的絕不對等，後來《熱風》中對法國學者「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我們一代的

²柳澤桂子，《生死書》，頁 30。

³柳澤桂子，《生死書》，頁 23。

⁴李何林主編，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增訂版，頁 15, 29, 37, 42。

⁵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台北：業強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 8。

⁶《朝花夕拾·父親的病》，《全集》第二卷，頁 288-289。

⁷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冊，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 37。

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⁸一說的認同，在此是可看到起源的。

第二節 「吾二十有四而志於學」——與傳統決裂的第一次自我放逐

一、「幻燈片事件」貫通生死

一九〇六年的「幻燈片事件」帶有豐富的現象學意涵。索科羅斯基指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是因為他有「超越自我」，即從所處的公共空間的角度、站在自己之外、之上的角度，觀照自己的能力，以下棋為例，若人群構成的公共空間是整個棋局，則其中的每個個人既是棋子，也同時具有下棋人的成分；這一「超越自我」使我們對自己在社會中的所說出的真相、做出的行為負起責任，能看到他人的可愛而報之以愛；這超越自我早已存在，它是每個個體得以進入公共生活、道德行為的基礎，而它可以被殘缺的他人的影象召喚出來，如一張早夭青年的照片，或一張尚未出生的、眼、嘴都還只是一小黑點的胎兒的照片，都可使人感受到「一個可以負責任的自我的印象」。⁹魯迅在仙台的幻燈片事件中，一個殘缺不全的中國人形象，就召喚出他的超越的自我。以下我們詳細討論這一召喚。

這種召喚是通過「凝視」(gaze)完成的。魯迅在幻燈片經驗中有兩種現象學的「凝視」方式在發生作用，一是魯迅作為「觀者」看到幻燈片主題之外的背景，進而以背景為主題，這種在顯性主題之外看到的隱性主題，猶如羅蘭巴特觀看照片經驗中的「刺點」(punctum)，這一字原意為針刺、小洞、小斑點、小裂痕，還有骰子、碰運氣之意，意謂在攝影者意欲傳達的主題以外的突兀，相片的刺點通常是偏離整個畫面主題的局部細節，會突如其來地破壞觀者接受整個完整畫面，把他與攝影者的觀點扯裂，使他心煩；無疑在幻燈片中作為配角甚至只是背景的「刀俎下魚肉的中國看客」，像破壞充滿整了畫面的勝利優越感的「老鼠屎」，刺傷魯迅的眼，使他心煩。¹⁰二是魯迅在看到幻燈片中，不但看見「看客」，同時也看見「看客在看」，看見他成為被這些想像中的看客所凝視的對象。就第一種凝視言，魯迅觀看的焦點從將被砍頭的中國人、行刑的日本人所組成的主題，移向作為背景的周圍看客，固然是拜攝影之所賜，因為攝影使原本微不足道的事物得以放大到可以「表述形容」的地步，¹¹但也反映魯迅不為較「可見的」畫面主題左右，看到那較「不

⁸ 《隨感錄三十八》，《全集》第一卷，頁 313。

⁹ 索科羅斯基，《現象學十四講》，頁 178-179。

¹⁰ Roland Barthes (羅蘭巴特)，《明室：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許綺玲譯，台北：台灣攝影《季刊》，一九九五年，頁 36, 54。

¹¹ 班雅明，《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頁 90；轉引自許綺玲，《魯迅寫攝影》，中研院「近代中

可見的」背景，並賦予意義的能力；這樣由「可見」到「不可見」再到「整體意義」的目光的流動，在現象學意義上是一上升到較高層次的統一性的過程。魯迅從一張將被砍頭的（或將被槍斃）中國人的影象中，看出整個民族的老邁衰蔽，顯然是他的「超越自我」的覺醒，使他的自我、主體性得以升高到整個民族的歷史之上，從「可見的」一小部分看到「不可見的」大部。

就第二種凝視言，魯迅看到了那些麻木的看客，就意味他已預設這些看客的主體能動性，也就意味他預設他（魯迅）自己同時也成為被這些看客所凝視的客體，魯迅與這些看客組成了互相觀看的一對（couple），形成一組互為主體的雙重凝視。現象學指出，畫家經常有「被所畫對象觀看」的感受，此時凝視者的「主動」同時也是被凝視的「被動」，推而廣之，觀者不但是「在外在世界中」被觀看，而且根本就是「被外在世界觀看」，觀者與被觀者在這樣的關係中已不分彼此，這種成對的關係本身要比觀者與被觀者更真實、更根本；¹²從這種角度看，魯迅發現了看客，也就是發現了魯迅／看客兩者間形成的更根本、更真實的「看（被看）／被看（看）」關係，這就是生與死、人與鬼的關係，幻燈片中「顯出麻木的神情」的中國人呆滯的目光背後，是一個巨大無比的黑洞，洞裡填著數千年逝去的中國人的屍骨，以及與他們共同積澱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這是個無底的黑洞、無從抗拒的結構，現在的生者在這些死去了的肉體與尚未死去的精神面前，簡直是一粟之於滄海，就像生要被死吞噬、人要被鬼吞噬；後來周作人曾精準地以「種業」概念說明這種對比：

蓋聞之：一國文明之消長，以種業為因依，其由來者遠。欲探厥極，當上涉於幽冥之界。種業者，本於國人彝德，駢以習慣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歲月，積漸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數百歲。逮其寧一，則思感咸通，之為公意，雖有聖者，莫贊一辭。故造成種業，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為數之多，與為時之永，立其權威；後世子孫，承其血胤者，亦並襲其感情，發念致能，莫克自外。．．．遺傳之可畏，有如此也。¹³

面對這幽幽種業，任何人都「莫克自外」，何況常人。魯迅看見這些看客，應同時感受到這種震動與戰慄。

以上兩種凝視其實開啓了一個無盡的「多重鏡像」。魯迅的凝視並未停在那些麻木的看客的眼光中，也沒有停在他們背後的文化傳統中，這一組「雙重凝視」一

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一六〇〇迄今（二）」研討會論文，二〇〇一年九月。

¹² Maurice 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trans., Alphonso Ling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7th paperback printing 2000), p.139.

¹³ 周作人，《望越篇》，轉引自丸尾常喜，《魯迅「人」與「鬼」的糾葛》，見陳漱瑜編，《說不盡的阿Q》，頁737。丸尾氏以《望越篇》為魯迅所作，其實原作係周作人，但魯迅作過修改，這是他們早年合作的模式，見《知堂回想錄》上冊，頁305-308。

且建立，就進一步無遠弗屆地衍生出無限多種雙重凝視的可能性；換言之，魯迅的目光通過這個鏡廊向各方發射，他的目光又反射回自身，射入自己的身體之內，又從自身射出，射向存有，射向生活世界，而魯迅也從這存有、生活世界中反瞻到自己，反瞻到自己所處的傳統。魯迅自己後來就用「凝視」一語來概括這種內外交融：「向外，在攝取異域的营养，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裡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¹⁴嚴家炎則用佛典《楞嚴經》中的「多重鏡像」來形容這凝視目光的流動：「道場中陳設，有八圓鏡各安其方，又取八鏡，覆懸虛空，與壇場所安之鏡，方向相對，使其形影重重相涉。唐之釋子借此布置，以為方便，喻示法界事理相融，懸二乃至十鏡，交光互影，彼此攝入。」並稱魯迅的小說就很已臻「交光互影，彼此攝入」的境界。¹⁵吾人以為，從現象學的凝視觀之，幻燈片事件之所以會對魯迅造成這麼大的震撼，正是因為幻燈片中看客的凝視目光為他打開了存有的潘朵拉之盒，使他通過這些目光與無限深遠、的存有深淵中的它者互攝，種下他日後的小說的「交光互影」的種子。

這一「雙重凝視／多重鏡像」的事件，是魯迅真正的啓蒙，是他人生的真正定向，借用孔子的話就是他的「（吾廿有四而）志於學」。在這次事件之前，魯迅先後被「客觀」與「主觀」所擺布：「客觀的擺布」，意指他十三歲起因祖父科場弊案下獄、被送到親戚家避難被稱為「乞食者」的刺激，十四歲因父親的病奔波於當舖與藥房間的「侮蔑」，十八歲想「走異路，逃異地」，卻因負不起學費只好到南京水師學堂，又入礦路學堂的隨波逐流；¹⁶而「主觀的擺布」，則意指魯迅寄希望於西學、啓蒙中土的願望，如他在南京時期接觸到嚴復式的進化論，這一挑戰中國傳統的「復古」思想、「五德輪迴」循環論的西來新說，使他嘗到「初皈神靈的狂喜」，為他灰色的生命注入了「俯視現實，俯視黑暗」的勇氣，¹⁷二十二歲赴日後，在弘文學院學習時繼續「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二十四歲入仙台醫專學醫，以救治像父親那樣的病人，並把新思想傳入中國為職志，¹⁸這些都是他為擺脫客觀困厄所作的主觀努力。但在這兩個階段中，魯迅的主體與生活世界是分離的，他還沒有找到那個可通往生活世界的缺口；直到幻燈片事件的「雙重凝視／多重鏡像」經驗，他才找到這個缺口，架通了自己的主體與生活世界，聽到了存有的

¹⁴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全集》第五卷，頁242。

¹⁵ 嚴家炎，《論魯迅的複調小說》，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134-135。

¹⁶ 《魯迅年譜》，第一卷，頁30-31；37-38；53-54。另參考《吶喊·自序》，《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¹⁷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頁25-29。

¹⁸ 《魯迅年譜》，第一卷，頁87-90；98；134。另參考《吶喊·自序》，《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召喚聲音，也藉此在文學、國民性批判上嫁接了博蘭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所謂「集中意識」（focal awareness）與「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¹⁹這才告別了少年、青少年的狃與狂。

魯迅在幻燈片事件的覺醒後棄醫從文，他也在受此啓發後，心量大增，發展出一種綜攝感性／理性、精神／肉體的心智結構。一九〇七年，魯迅連寫了《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數篇大文，這是他第一個創作高峰期，這些論文酣暢淋漓，它們的內容有一共通的母題，就是「理想的人性」，我們可以說，這些論文就是對魯迅還在弘文學院時與許壽裳經常討論的問題「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的回答；我們又可進一步說，幻燈片事件的覺醒，觸發了他探索理想人性的視角。這一視角就是主客交融的肉身主體意識。

試以《科學史教篇》爲例。魯迅在本文中所謂「科學」，其實是超越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對立的「圓滿人性」的代名詞。所謂科學，係起於探索自然、終於改革社會（『歷探自然見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於社會』），科學必然與時俱進，故後出者必勝過其前輩；科學的發現，多賴「超科學之力」，即人的「非科學的理想之感動」，或曰「聖覺」；是故科學家必有健全的人格，包括「常恬淡，常遜讓，有理想，有聖覺」；就方法言，培根的歸納法、笛卡兒的演繹法都屬一偏，科學上的發現必須「二術俱用」；科學探索必起因於純然的追求真理，但其成果多能對社會有實際貢獻，平時可興實業，戰時則可救國，如法國大革命戰爭期間學者孟耆（G. Monge）以其提煉硝石之法傳授國人，製成大量火藥，法國才解聯軍圍攻的燃眉之急。魯迅最後強調科學的根本在健全的人性：

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於拿坡倫之戰將云。．．．顧猶有不可忽者，為防社會入於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

人類社會既需要牛頓、波義爾、達爾文，也需要莎士比亞、拉斐爾、貝多芬。²⁰與其說魯迅強調科學，不如說他已經看到科學背後的人性全面性發展的必要，科學這一理性事業的進步，卻要由科學家的全面發展的人格來推動，而全面發展的人格則包括齊克果的存在的美學（『美上之感情』）、倫理（『恬淡』、『遜讓』）、

¹⁹博蘭尼著有*The Tacit Dimension*，所謂「集中意識」是指吾人思想時的集中的興趣或意圖，而「支援意識」則指思想時受到過去潛移默化的影響，支援意識其實是集中意識的根據，故支援意識又可稱爲「默會之智」（tacit knowledge）。參考王東華，《發現母親》，下冊，頁97-102；另參考<http://www.sveiby.com/articles/Polanyi.html#Main%20Theses>。

²⁰《墳·科學史教篇》，《全集》卷一，頁29-33, 35。

宗教（『聖覺』）三面向，²¹這正是「最理想的人性」的體現。

《摩羅詩力說》則從另一角度闡發這理想的人性。本文中幾位「摩羅詩人」共有的個性，就是反抗一切外在權威，抽離一切利益，唯自己的生命是恃，「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²²；這生命力為何？即進化之力，變革之力，否定之力，「撻人」之力，「人得是力，乃以發生，乃以繁衍，乃以上征，乃至於人所能至之極點」。²³文中摩羅詩人之一拜倫（裴倫）正是這種典型，他「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蕩滌，瞻前顧後，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率真行誠，無所諱掩，謂世之毀譽褒貶是非善惡，皆緣習俗而非誠，因悉措而不理」，他有矛盾但完整的個性：「柔而剛，疏而密，精神而質，高尚而卑，有神聖者焉，有不淨者焉，互合和也」。²⁴另一位摩羅詩人雪萊（修黎）則以慧星般三十年生命，直搗人與自然、生與死的邊界，他自幼徜徉山林，「心弦之動，自與天籟合調」，養成「無量希望信仰，暨無窮之愛」，使他「窮追不舍，終以殞亡」，他認為生命的秘密要靠死亡來解開：「人居今日之軀殼，能力悉蔽於陰雲，惟死亡來解脫其身，則秘密始能闡發」，為此他甚至自沉數次試圖解開此迷。²⁵

《文化偏至論》把個性的獨立提到空前的高度。本文認為文化的發展往往為矯往事而趨於偏頗，十九世紀政治民主、經濟富足，物質文明盛已是歷來之冠，但仍不足「盡人生之本」，人生之本在自我價值的肯定，在於自己做自己最終的立法者，自塑人格，自己為自己負責，不假他力，這才是人的本來面目；²⁶他說，「人必發揮自性，而脫觀念世界之執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²⁷，即此之謂。又何謂「自性」？十九世紀初，黑格爾主張以客觀入於主觀，席勒則以「感知兩性，圓滿無間」為「全人」；魯迅則認為，這種全人在現實中必不可得，自性的表現應是「能於情意一端，處現實之世，而有勇猛奮鬥之才，雖屢蹈屢僵」，以「作舊弊之藥石，造

²¹ 齊克果的存在三層面，參考威廉·白瑞德（William Barrett），《非理性的人：存在哲學研究》（*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彭鏡禧譯，台北：立緒文化，二〇〇一年，頁191-199。

²² 《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全集》卷八，頁25。

²³ 《墳·摩羅詩力說》，《全集》卷一，頁68。

²⁴ 《墳·摩羅詩力說》，《全集》卷一，頁82。

²⁵ 《墳·摩羅詩力說》，《全集》卷一，頁84-87。

²⁶ 王乾坤稱這種最終立法者為「原我」，見氏著，《回到你自己：關於魯迅的對聊》，中國文聯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54。

²⁷ 《墳·文化偏至論》，《全集》，頁51。王乾坤把「惟此自性，即造物主」八字視為《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幾篇論文的精髓，見氏著，《魯迅的生命哲學》，頁120-121。

新生之津梁」，「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²⁸

魯迅一九〇七年的這幾篇長文，其實正是把幻燈片事件中的「看者」與「被看者」的「雙重凝視」這一更根本、更真實的關係，形諸文字的闡述。這些論點的問題意識雖在更早的弘文學院時期已經形成（『何謂理想的人性』），但幻燈片事件的凝視經驗，卻使魯迅「開竅」，得窺生活世界與人的存在狀態，體悟到個人生命不但與外在世界密不可分，生命之中甚至充滿了死去的鬼氣，所謂理想的人性，就是在這重重時空制約中追求獨立。幻燈片事件的雙重凝視提供的是回答「何謂理想人性」的前提條件：雙重凝視讓魯迅看到人的限制、依賴，唯有在此限制的現實中，人的「獨立」才有意義，否則連限制、依賴都不知道，就根本不會有「獨立」的必要了。周揚認為魯迅早期的文言文作品展現了他的「天才」（genius），不同於其他人物只能說有talent，王乾坤認為魯迅的「天才」正在於他展現了真正的「獨立」性，這些長篇論文呈現的就是魯迅掙脫「名譽」、「利役」的物役，敢以自性為中樞，去有限樊籬而趨無限絕對，但又立足於現實的自我期許；²⁹我們可以說，幻燈片事件的雙重凝視，實在是形成這天才的「前見」、「前方便」。

上述諸文中較不明顯，但卻在同時期蘊釀的，是絕望／希望這一組對立，其直接原因是兩次出版企圖的失敗，與受母命與朱安完婚。他試辦《新生》雜誌及編譯《域外小說集》的失敗經驗，種下了他絕望感的種子，這兩次失敗一前一後包夾住前述那幾篇慷慨激昂、濃墨重彩的長文，在他生命中留下同樣深刻的印記。一九〇七年夏，魯迅與許壽裳、周作人、袁文蕪、蘇曼殊等人辦過文藝雜誌《新生》，這是魯迅離開仙台醫專後第一次啓蒙的努力，當然抱有很高的期待，魯迅從刊名、封面設計、書內插圖等都親自安排，但後因資金出問題而終未出版；³⁰對這一高度希望的破滅，魯迅的回憶是：「《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³¹

一九〇九年，魯迅又與周作人編譯《域外小說集》，這次他仍然抱有相當期待：「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結果第一集印了一千冊，分別在東京及上海發售，除東京的一份日文雜誌注意到這件事

²⁸ 《墳·文化偏至論》，《全集》第一卷，頁54。

²⁹ 《魯迅的生命哲學》，頁121。

³⁰ 《魯迅年譜》，第一卷，頁187。

³¹ 《吶喊·自序》，《全集》第一卷，頁417。

外，只賣了二十冊，第二集改印五百冊，也只賣掉二十冊。³²魯迅日後對這次失敗的追述開始透露出「絕望」之感：「第三冊只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版，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全消滅了。」³³兩次努力都是全力以赴、志在必得，兩次結果都是人財兩空、一無所有；這是現實、理想的兩重幻滅，生活世界的殘酷現實帶來兩次重挫，可見失敗並非偶然，並非「非戰之罪」；如果說《新生》的失敗讓魯迅「夢醒」，《域外小說集》的失敗再一次無情地粉碎啓蒙的努力，當使魯迅「真醒」，對自己、對世界都有更清楚的認識，「絕望」感使他對「啓蒙的背景」、「啓蒙者」、「被啓蒙的對象」及「以何啓蒙」，都有新的體認，他的意向將與生活世界的意向弧進一步磨合。

二、與朱安結婚的「無愛之愛」

對形成魯迅的絕望感具有更大效力的，是奉母之命與朱安完婚。王得后正確地指出，與朱安結婚對魯迅一生的志業有不可忽視的影響，這樁舊式婚配為魯迅設定了舊式的社會關係基調，這一關係的「存在」使他背上了死而後已的「供養」責任，使他「作一世的犧牲」而不敢追求真愛，使他一旦發現真愛還需瞻前顧後，使他在真愛之後還須承受「啓蒙者娶小老婆」的致命「流言」。³⁴本文要進一步討論這一事件對形成魯迅絕望的「徹底性」的影響。首先，必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無愛的對象結合，這裡父母與結合對象都屬於舊思想的陣線，可以在感情上接受或反對，接受意味向舊思想投降，反對則意味向舊思想宣戰，都算痛快，這種痛苦姑且稱為「一重矛盾」，是當時啓蒙者追求「自由戀愛」下的共同母題，光這一點魯迅顯然並不孤單；但魯迅自己還有一較特殊的處境，即他真誠地敬愛他的母親，敬愛她的人格甚至思想，朱安等於是「他所愛的人送他的禮物」，他不能在感情上一攬子接受或一攬子拒絕母親與朱安兩者，這種痛苦較前面的一重矛盾更甚，他的心理與情感將承受更多重、曲折的折磨、否定、挑戰，可說是雙重矛盾所開啓的多重矛盾，正是在這一層面上，與朱安結婚對魯迅言帶有更複雜的如死亡般無所逃的「贈予」意義³⁵。

魯迅在這樁婚事上一開始就處於完全無法掌握的被動狀態。一九〇一年，身陷科場弊案的魯迅祖父獲釋回家，魯瑞就已準備為魯迅物色妻子，次年魯迅赴日，魯瑞就加快了訂親的腳步；一九〇三年魯瑞將這門親事告知在日本的魯迅，魯迅還希

³² 《魯迅年譜》，第一卷，頁 211-213。

³³ 《域外小說集序》，《全集》第十卷，頁 161-162。

³⁴ 王得后，《《兩地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頁 267-273。

³⁵ 有關死亡的「贈予」意義，參考本論文第二章。

望有挽回餘地，想請朱安另嫁他人，後來在叔父周冠五去信勸說下屈服，但要求朱安「放足」、「識字」，同年魯迅便寫了「靈台無計逃神矢」的自題小像詩，題在照片上贈送許壽裳；朱家以朱安年紀已大為由，希望儘快完婚，魯瑞便在一九〇六年七月，以母病為由，誣魯迅由日返國，與朱安完婚。³⁶魯迅回國後才發現朱安仍未放足，以前的信都是白寫；³⁷完婚後四天，魯迅就又東渡日本，一去三年。

段國超已指出，魯瑞把對長輩的敬重看成是責任，但絕非迂孝，而是一種結合道德規範驅使與相處後感情的真摯流露。魯瑞雖未受過正式教育，但她的個性、思想、人格都極為出眾。魯瑞生於舉人之家，排行第三，一直極為出色，宜室宜家，既愛勞動，精通針黹、廚藝等傳統婦女技能，又喜求知，靠偷聽教導兄弟塾師授課，具備閱讀小說的程度，讀過《水滸》、《三國》、《西遊》、《鏡花緣》等舊小說；她個性活潑，愛看戲、猜謎、唱小調，十分討人喜愛；嫁到周家後是當家的長孫媳婦，「裡外一把手」，與長輩平輩相處盡心盡力幾十年如一日，贏得各方好評，但她對長輩並不盲從，對長輩過份的缺點也敢於批評，如公公周福清（魯迅祖父）辱罵繼室蔣氏，魯瑞即正色抗議不該給兒孫做壞榜樣，周福清竟一言不發走開。³⁸魯瑞的思想開明，從不迷信，沒有鬼神等禁忌；對兒子的感情可說是「開通、開放的愛，包含卓識遠見的愛」，如她不顧各方流言、頂住各方責難，在家計艱困之下籌錢讓魯迅、周作人去南京求學；魯迅赴日後寫信勸她剪髮、放足，她回覆稱足已放、髮會剪，且她的放足在紹興被人中傷為想再嫁，她卻置之不理。³⁹魯瑞的正義感、勇敢、開明，必然影響魯迅，據許廣平透露，魯迅曾說：「我的母親如果年輕二三十年，也許要成為女英雄呢。」⁴⁰許廣平戲稱魯迅「嫩棗棗要娘」（詳後），實為魯迅對母親真摯感情的流露。這由衷的敬愛是魯迅事母至孝的基礎。

對自題小像中「神矢」一語，許廣平認為應與受命完成與朱安的舊式婚姻有關；李天明、馬蹄疾也持此論，並認為「寄意寒星荃不察」的「荃」指的就是對他不理解的母親，只好「我以我血薦軒轅」。⁴¹魯迅後來承認：「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

³⁶ 綜合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收於《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女性筆下的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 256，及從《《自題小像》看魯迅的婚姻》，作者不詳，引自<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11203/200112030005.html>。

³⁷ 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轉引自王潤華，《魯迅小說新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二年，頁 5-6。

³⁸ 段國超，《魯迅家世》，教育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137-144。

³⁹ 段國超，《魯迅家世》，頁 149-151。

⁴⁰ 許廣平，《欣慰的紀念·母親》，收於《許廣平文集》第二卷，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5。

⁴¹ 見許廣平，《讀點魯迅叢刊》第二輯《我解說〈神矢〉的根據》；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

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的。」⁴²魯迅視這位妻子為無所遁逃的命運，就是「母命難違」，雖極不願意也終於屈從，細說起來又還包含有兩個原因：一是魯迅當時自認身處革命時代，死無定期，母親需要有人陪伴；二是當時魯迅家道中落，家境困窘，而朱安之父在外經商，頗為富裕，與之結親可名正言順地受其接濟。⁴³這兩個考量，都置魯迅於極度被動甚至屈辱的境地，甚至說是「城下之盟」都不為過；我們可以說，正是這樣的極度被動，刺激魯迅日後以絕大的主動意志加以反擊，面對這「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這「慈母誤進的毒藥」的悲哀，他採取「玉石俱焚」策略，終生未與朱安同房，甚至話都不說幾句。這是一種第二章提到的「順勢療法」：既然「夫妻」在心靈上不能契合，那乾脆連肉體上也不要發生關係，既已「絕望」，索性「絕望」到底。

魯迅與朱安間無話可說涉及「失語」問題。第一章提到，根據梅洛龐蒂的看法，所謂「失語」是一種「使用適當語言表達」能力的喪失，失去說某種語言的能力就是失去那種思想，不可能有「有某種思想但說不出」的情形。魯迅與朱安間「無言以對」，正反映魯迅的「絕望」感，在絕望中，任何話語都是矛盾的、無法貫徹的、沒有生命力支撐的，試看魯迅有關失語的夫子自道：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44

這正是面對朱安時的語境：面對朱安，他只有沉默才覺充實，失語就是「沉默時感到充實」，在絕望中，生命是得不到語言表述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相對無語中又必須與朱安說話。對朱安他只被動地回話，如同桌吃飯時朱安問他飯菜的軟硬鹹淡，他只用最簡單一個字回應；或只說非說不可的話，如在他與周作人絕裂要搬出八道灣住宅時，希望朱安回紹興老家或留在八道灣等。⁴⁵這種話語實比無聲還要沉默得可怕，因為這是徹底絕望之後的生活、絕望後不得不說的話，所以是「絕望的絕望」。但正是在這種絕望的絕望、絕望後的生活中，我們極為弔詭地觸及主

魯迅〈野草〉探秘》，及錫金，《魯迅詩本事》，載《文學月刊》，1956年11期。均引自從《《自題小像》看魯迅的婚姻》；馬蹄疾，《魯迅新傳》，台北：新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頁42。

⁴²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⁴³ 見段國超，《魯迅家世》，頁194-195。作者指出，周家與朱家聯姻係出於經濟考量的論點，最先是日本學者高木壽江提出的。

⁴⁴ 《野草·題辭》

⁴⁵ 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頁254。

客合一的肉體生命。這有幾層意義：第一，這些被動的、不得不說的話，與他與朱安之間的失語一樣，都是「真」的話，沒有虛偽成份；第二，這些話背後是極大的生命動力，無愛的人生要求的是與「能愛」同樣大的精神力量，即魯迅所謂「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⁴⁶的力量，這是第二章所謂承擔「無限責任」的「犧牲經濟學」，「能愛」與「能不愛」在這裡相互糾纏，彼此互為支撐，自從魯迅實質上拒絕與朱安的婚姻關係後，他就身體力行著這「無愛之愛」，這種無愛之愛會在他日後從許廣平那裡遇著真愛時受到威脅，使他依違於愛與不愛之間，從而發為他最動人也最難解的文字《野草》，容後再論。

這裡最重要的發展，可能是兩次失敗帶來的絕望感，將使魯迅把「自己」當作審視、批判的對象，這是重要的現象學躍升。這樣的絕望使魯迅的生命策略帶有一種現象學的意涵：這使他陷於一種應然與實然的悖離狀態，他的啓蒙信仰、論述動力乃至人生定向被連根拔起，他被拋向價值的真空，他無枝可依。這樣的失根、飄浮狀態固然可怕，但同時也是使人把握自己、回歸自己，也就是回歸事物本身、回歸「現在」的必要條件，只有在這種狀態中，人的真面目才會向自己開顯，人才能觸及真的自我；這就是現象學所謂的明證（evidencing），其達到的是「顯露之真」（truth of disclosure），這是以實踐檢驗理論的「確然之真」（truth of correctness）的基礎。⁴⁷我們似可推論：魯迅的畸形婚姻在他身上正是發生了這樣的作用，他的絕望使他的本來面目向他開顯，他不再需要「路」，他就是開路人。

我們若將魯迅與胡適兩位對自己無愛的婚姻的態度加以比較，就可看出魯迅那裡愛與生命（死亡）的結合程度要高於胡適。胡適與魯迅一樣，婚前並無戀愛，自承「吾乃澹蕩人，未知愛何似」，⁴⁸也與魯迅一樣，與無愛的對象完婚；與魯迅不同的是，魯迅在要求朱安識字、放腳未果後，他就把這樁婚事當作一場戲，婚禮完全聽任舊習擺布，但胡適卻對他無愛的婚禮認真起來，廢去拜天地的「陋習」；⁴⁹這些都反映胡適對與江冬秀結合「自我感覺良好」，他在日記裡披露：「他（高夢旦）說許多舊人都恭維我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說，他的敬重我，這也是一個原因。．．．他說，這是一件大犧牲。我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這已是佔便宜了。最佔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於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

⁴⁶ 《熱風·隨感錄四十》

⁴⁷ 見索科羅斯基，《現象學十四講》，頁 230-231, 239。

⁴⁸ 胡適與江冬秀訂婚後於一九一〇赴美求學，一九一七年學成回國與江完婚；一九一五年十月在一首《相思》詩中有「語我故鄉事，故人頗思我。吾乃澹蕩人，未知愛何似。」見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頁 30-31。

⁴⁹ 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頁 42。

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⁵⁰

胡適沒有說謊，但他走的確是一條順順當當、別人已走成大道的較無阻力的路，他雖「不曾求人讚許」，卻確實在這路上「行吾心之所安」且「佔便宜」了。魯迅完全不同，他選擇了一條沒人走過的路，或簡直是在沒路的地方踏出他的步伐。他那魏連殳式的接受舊儀，其實是以全付生命力否定這舊儀背後的傳統，是所謂「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的輕蔑；就算我們不為賢者諱，把魯迅不滿意朱安容貌不佳的因素算進去，他與朱安的「婚姻」看似名實的分離，仍是為了成全真愛的靈肉合一，是一條最艱難的、各方都不討好的路：從「新」道德來看，他自己與朱安都必須忍受生理上獨身的「不人道」生活，用婚姻枷鎖套住自己與朱安，兩人都未「解放」；從「舊」道德來看，他要忍受「無後」壓力，乃至旁人對這有名無實婚姻的異樣眼光；從經濟角度看，他必須為朱安付出死而後已的生活費用，一生扛著不輕的負擔；從「心安」角度看，他選擇這樣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做一世的犧牲」，就是選擇以連根拔起的生命向幾乎所有的價值宣戰，他所恃者，就是「獨有『愛』是真的」，「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⁵¹

第三節 「四十而立」——體驗真愛與第二次自我放逐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可說是魯迅生命歷程中的「而立」階段，此期間他真正享受到靈肉合一的愛情，但也第一次面臨生死關頭，使他對生死、男女都有了更深入的體會與經驗，更堅定而深入地立足於生活世界，他的生死真正與他的事業相結合。這時期魯迅生命經驗中的大事是與周作人決裂，與許廣平戀愛，生了一場影響一生的肺病，並在「女師大事件」的論戰及「三一八慘案」後，遭當局威脅生命安全，而關鍵是他的戀愛。這段期間魯迅的敵人不再只是前一時期的守舊派，而是曾經共同奮戰過的戰友甚至自己的學生，他們的手段也不只是公開的論戰，還用無形的流言、形構無所不在的壓力，這些身心的痛苦與愛情的對立，讓魯迅更深地穿透「意識」、「身份」的虛偽，更接近肉體生命本身，在這一階段後魯迅也揮別了十幾年的北京學官兩棲生涯，到廈門過單純的教書生活，以擺脫敵人企圖賦予的「身份」，找回自我。

許多研究者認為二〇年代中期的女師大事件是魯迅思想變化的重要轉折點。李澤厚指出，一九二五年春參與女師大事件之前，魯迅的社會批評只指向廣泛的社會現象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但其後則直接攻擊章士釗、段祺瑞等統治階級本身及

⁵⁰ 《胡適日記》，香港：中華書局；轉引自周質平，《胡適與韋蓮司：深情五十年》，頁 112-113。

⁵¹ 見《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及《熱風·隨感錄四十》，《全集》第一卷，頁 137，頁 322。

陳源、楊蔭榆等「幫兇」，這一更具體、直接的鬥爭把魯迅與「五四」時期的同輩區別開來，這一時期形成的很多觀點，成爲他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前提；⁵²孫郁認爲，魯迅在女師大事件中與陳源的筆戰，是首次展現他「單馬直入，尖刻的、不留情面的筆觸」及「激越、苛薄、冷酷」的論辯才能；⁵³林賢治注意到，這段期間魯迅的雜文反映了兩點態度的變化，一是對言論界代表的憎惡已超過實際權力者，看出讀書人心思大抵暗含殺機，二是從「三一八事件」青年的犧牲，重新看到「希望」；⁵⁴嚴家炎認爲，魯迅的創作思想在二〇年代中期發生微妙卻顯著的變化，這與他大量吸收表現主義的文藝材料有關。⁵⁵本文擬從性別與生死的角度，對以上學者的論點加以補充。

一、與周作人決裂

我們從肉體生命意識的取徑觀之，魯迅與周作人之間有深層的共通點，而在表層上又可互補：深層的共通，就是兩者都是「直面人生」、接受人生慘苦的現實，且兩者都不以終極樂土自我麻痺；表層的互補，則是周作人將慘苦默識於心，苦中作樂，魯迅則秉筆直書，以承擔慘苦爲己任。孫郁就認爲，周作人提倡小品、贊賞「言志」文章，固然基於讀書的愛好，也是出於對於現實的反動，因爲看到社會太黑暗，只好走上這隱喻一途，這算是他「大的人生無奈」，而左翼文人的攻擊，就是沒有看到這隱喻的一面。⁵⁶我們或可說，魯迅說出了周作人想說卻未說出、卻用隱晦之語掩蓋的話；兩者都是「真話」，不過「探底」深度不同，周作人寫出表相的機鋒，魯迅則直搗機鋒下的矛盾，一老辣一尖刻（借用孫郁語），真是同胞兄弟，心有靈犀一點通。

他們二人對如何啓蒙的辦法，似乎也有相通之處，就是都採用接近現象學式的途徑。現象學與現代科學的企圖不同，現代科學企圖去「確證或否證一項宣稱」，採取的是把該宣稱放入「引號」的策略，而現象學則企圖「思考一項宣稱」，讓該宣稱「保留在自身中」，讓它自行呈現，採取的是把宣稱放入「括弧」的策略。⁵⁷由此觀之，魯迅對國民性改造的啓蒙事業，從一開始就是現象學式的，即不在「開

⁵² 李澤厚，《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收於《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論魯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 102-103。

⁵³ 孫郁，《與現代評論派的論爭·導言》，陳漱瑜編，《魯迅論爭集》（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149-150。

⁵⁴ 林賢治，《人間魯迅》上冊，頁 584-585。

⁵⁵ 嚴家炎，《論魯迅的複調小說》，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 119。

⁵⁶ 孫郁，《魯迅與周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 226。

⁵⁷ 索科羅斯基，《現象學十四講》，頁 273-274。

藥方」，而在「暴露病徵」，用他的語言來說，就是「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⁵⁸，意謂只要如實呈現真相，是「為人生」、「改良這人生」的關鍵。周作人的啓蒙觀也近於此，他曾回顧：「上午作論，文機鈍塞，半日不成一字，飯後始亂寫得百餘字，草率了事。顧予甚喜，此予改良之發端，亦進步之實證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懺悔；然欲心有所得，必當盡棄昔日章句之學方可，予之拼與八股尊神絕交者，其義蓋如此。」⁵⁹止庵指出，周作人思想的最深處就是「愛真實」、「疾虛妄」，表現為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以及荀子的「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周作人對真實的「理解」，既體現在他的「言」，也體現在他的沉默中；⁶⁰這些都是「如實呈現自己」的現象學路子。

兩人無意間觸及的共同議題最能看出這種共通性及互補性，對「流氓」的看法可為一例。周作人曾自述幼時對流氓的好感，因為做流氓要有「忍辱忍苦的勇氣」，要能禁得起歐打、刀戳，其最大的功業是「打翻又爬起，爬起又打翻」，而他們不講道理的詭辯裡又充滿「詼諧與愛嬌」，如小流氓在街上與人相撞，反會詰問「難道撞了反倒不好麼？」又如周作人有回與家人向廟台主人租了坐位看戲，後來台主因要另租給闊人而下逐客令，他的小流氓朋友阿九恰巧在場，路見不平，但並不蠻來，只對台主說：「你不租了麼？那由我出租給他們了。」結果台主不但收回成命，還對阿九賠了許多小心。⁶¹周作人的觀察細膩，把挨打、挨戳與不講道理的詭辯兩相對照，算是一筆出入兩清的帳，流氓的「苦」自然流露紙上。

魯迅也很注意流氓，但他的處理態度不同，他把周作人筆下晚清紹興的「流氓道」放進歷史、倫理學、政治學的無限縱深中，讓人看到周作人的「詼諧與愛嬌」之下的幽暗沉重與複雜多面。在《流氓的變遷》中，魯迅爬梳了先秦至今的「流氓」，最早的俠是「墨子之徒」，他們有一種「至於以『死』為終極的目的」的「老實」，這些「真老實」的俠終於「逐漸死完」，留下「取巧的俠」，至漢成為與官府糾纏不清的「盜」，俠氣日減，奴性日增，當代的流氓則完全倚恃「傳統的靠山」、欺壓一切弱者，⁶²可算是「面向老虎時是羊、面向羊時是老虎」的徹底奴才了。

我們在魯迅筆下看到周作人感到「詼諧」的流氓行徑背後長達數千年的墮落史，這裡不宜把魯迅的「（流氓的）變遷」單純地理解為時間上的嬗遞，因為這樣會掉入魯迅終其一生致力批判的復古主義中；吾人認為魯迅筆下的「墨子之徒」是一種

⁵⁸ 《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全集》第四卷，頁 512。

⁵⁹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台北：龍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 152。

⁶⁰ 止庵，《編後記》，收於止庵編、周作人著《關於魯迅》，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 676。

⁶¹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頁 81。

⁶² 《三閒集·流氓的變遷》，《全集》第四卷，頁 155-156。

邏輯上的俠的「原型」，他們體現的是用死為本錢去做買賣的「無限責任」或「犧牲經濟學」，由此觀之，魯迅並未站在流氓的對立面，相反地他是站在流氓的原型——俠的立場來惋惜、痛心俠氣的墮落的；這裡可看出魯迅與周作人的深層的相通點。他們都看到「俠」、「盜」、「流氓」這些只有「身體」作為本錢的人具有人性整全發展的潛能；但周作人的意向僅止於「看到」、僅止於對流氓的簡單的同情（或認同），他通過這簡單的同情，卻輕輕卸除了與這些流氓進一步聯繫的責任；魯迅的意向卻在「看到」後繼續折射出「愛」、「恨」、「承擔」這些情感，尤其是最後這承擔，使他與他所批判的做「沒本生意」的流氓，難捨難分；這是魯迅一生痛苦、而周作人一生閒適的根源。

諷刺的是，魯迅與周作人在現象學式的啓蒙努力中相得益彰，兩人的決裂似乎也是現象學式的。一九二三年七月兩人的決裂是魯迅思想發展史中最大的迷團。一般公認兩人鬧翻是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引起的，周作人對此已表明「不辯解」，因為「一說就俗」；⁶³中共學界則總結可能原因有二，一是魯迅不滿周作人妻羽太信子揮霍，導致羽太向周作人告狀，二是羽太說魯迅調戲她，目的則是把魯迅及周建人驅逐出八道灣。⁶⁴外籍學者卜立德（David Pollard）指出可能的另一原因，是周作人已在北大立足，亟於脫離魯迅對他思想的宰制。⁶⁵無論如何，這一事實本身就帶有濃厚的現象學及解構的意涵：這種結果是語言無能解釋甚至描述的，它是魯迅一生重大打擊中唯一一次家族內部的變故，這就已涉及超越語言的血親之情，更涉及這血親之情的否定；它對魯迅的影響恐怕是難以「筆墨」形容的，至少事件發生後魯迅大病一場，也有論者指出魯迅後來的「復仇情結」及「受騙情結」，這次事件是一誘因。⁶⁶

二、與許廣平戀愛

前一節指出，魯迅與朱安的婚姻將他靈肉撕裂，為保持靈魂的純淨他選擇犧牲肉體並承擔家庭責任，以無愛去愛。這一決絕的生命大力一旦受到真愛滋潤，無疑會釋出驚人的能量，但已婚的制度羈絆、他的名望地位及隨之而來的人心險惡，卻再度將他撕裂，使他的情場猶如生死戰場。

胡尹強高度重視魯許之愛的強大力量，他同意魯迅對《彷徨》較諸《吶喊》「技術……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⁶⁷的自我評價，並指出造成這差別的原因

⁶³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下），頁 479-480。

⁶⁴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 72-82。

⁶⁵David E. Pollard, *The True Story of Lu Xun*, H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2.

⁶⁶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頁 83。

⁶⁷《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全集》第四卷，頁 456。

就是愛情。胡氏認為，相較於《彷徨》，《吶喊》諸篇的主題人物絕大多數是庸眾，啓蒙者的刻畫遠較單薄，其中沒有當時最受關注的戀愛婚姻題材，其創作也多出於對編輯朋友的責任（所謂『遵命文學』），而非出於非寫不可的感情動力。⁶⁸

胡尹強尤其認為《野草》是這段真愛的密碼。他在李天明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深入闡釋《野草》作為愛情密碼的喻意，指出這部散文詩是魯迅為他這段婚外的真愛作證。⁶⁹胡氏指出，魯迅的雜文集都是將已發表過的文章編成集後再予命名的，唯有《野草》是先有「野草」書名，再逐篇創作、集結成書的，而「野草」就有「婚外戀」的意涵，可視為魯迅隨著與許廣平戀情的發展，按時序寫出的散文詩。胡氏把《野草》廿三篇分為四部分，依序寫出從兩人心心相印，萌生愛意，戀情幾乎在社會壓力下中斷，及決定衝破羅網共同生活等階段魯迅內心的矛盾、苦樂。以下略述胡氏的觀點。

從《秋夜》到《復仇（其二）》的六篇，寫的是魯迅初嘗戀愛滋味時即預見失敗的絕望感。《秋夜》作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胡氏推測，當日魯迅赴女師大辭教，但被大批學生包圍、挽留，魯迅從參與其中的許廣平的強烈反應中感受到愛的萌芽，發為本文—「秋夜」喻中國封建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主的婚姻文化，「小粉紅花」、「小青蟲」喻許廣平，哇叫一聲的「夜遊的惡鳥」是發現真愛的魯迅自喻，而小青蟲撲上去的「火」則是指真愛情；⁷⁰《影的告別》中「黑暗」喻無愛的婚姻，「光明」則喻真愛，「彷徨於無地」喻愛也不是、不愛也不是的進退維谷，意謂真愛的出現攪亂了魯迅習慣的「古寺僧人」生活形態，影的「獨自遠行」、「被黑暗沉沒」則反映魯迅意識到這師生戀的必然失敗，自己仍將終老於舊式婚姻的黑暗中；《求乞者》的「乞丐」形象是魯迅自喻，乞求就是向她乞求愛情，是在愛情面前的自卑感的反射，「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至少將得到虛無」則寫出戀愛失敗的焦慮；《我的失戀》寫的是魯迅對許廣平愛意的回饋嚴重不相稱，貓頭鷹、冰糖葫蘆、發汗藥、赤練蛇都只是自珍之敝帚，幾近於「黑暗和空虛」；《復仇》表現了對那些窺伺魯迅戀愛隱私、到處傳播者的報復，反映他已隱隱感受到這段戀情的危機；《復仇（其二）》則表現他倆的戀愛具有參與開創「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的啓蒙意義。⁷¹

第二部分包括從《希望》到《過客》五篇，寫出魯迅對許廣平的愛意愈趨主動，

⁶⁸ 胡尹強，《破毀鐵屋子的希望》，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 67-68。

⁶⁹ 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又央，《《野草》：一個特殊的序列》，《魯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三年第五期。均轉引自胡尹強，《魯迅：為愛情作證—破解《野草》世紀之謎》，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頁 2-34。

⁷⁰ 胡尹強，《為愛情作證》，頁 43-58。

⁷¹ 胡尹強，《為愛情作證》，頁 59-75；79-82；89-91；96-97；106。

但焦慮也愈深。胡尹強認為，自一九二五年起，許廣平開始擔心兩人的愛情將使魯迅陷入婚外情的窘境，而有些裹足不前，魯迅即作《希望》，對她（『身外的青春』）遲未表達進一步愛意有所不滿，並主動傳達愛的決心（『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雪》中「朔方的雪」象徵魯迅理想中的人格，它以此自勵並勵許廣平；《好的故事》是以水中之影、陰陽交錯的意象折射出魯迅心中對男女交歡的嚮往；篇幅較長的詩劇《過客》是表現愛意與妬忌的作品，其中老翁與過客分別代表魯迅性格中虛無消極與執著理想的兩面，女孩則代表許廣平，老翁與過客的對話是魯迅對許廣平愛情的衝突矛盾的表現；而過客所謂「倘使我得到誰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眼看見，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則是以兀鷹自喻，以死屍喻許廣平，以兀鷹與死屍的關係喻兩人的愛情，以她為他的美食。⁷²

從《死火》到《死後》六篇均寫夢境，實則意謂魯迅與許廣平戀愛的真正開始。《死火》是《野草》中《兩地書》許廣平致魯迅第一封信後的首篇，作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六日許廣平「秘密窩」（《兩地書·十三》改為『尊府』）探險後七日，胡尹強認為這天是魯、許確認愛情關係之日，文中的死火是魯迅自喻，「我」則為許廣平，遭棄於冰谷中的死火被「我」的溫熱驚醒，正是許廣平的愛情重燃魯迅生命火花之喻，火寧與「我」衝出冰谷燒完也不願留在谷內滅亡，意謂他們已開始思索爭脫婚外戀困境的方法了，而「我」躍出冰谷後被輾死於輪下，則隱含她的愛情中自我犧牲的悲壯；⁷³《失掉的好地獄》作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其時「女師大風潮」已開始月餘，那「偉大」「美麗，慈悲，遍身有大光輝」的魔鬼，象徵封建婚姻文化，而通過戰鬥打敗魔鬼統治地獄的「人類」，就是女師大事件中的「正人君子」，他們所立的新規範、秩序、道德，較魔鬼之下的封建文化，刀山油鍋更為嚴酷，有過之無不及，這是魯迅戀愛進入穩定階段時更深層的不安；《墓碣文》的死屍是魯迅自喻，「我」仍喻許廣平，「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意謂兩人的愛情內外阻力排山倒海，但卻正是這一段真情的希望所在，胸腹俱破、中無心肝，決心自食卻永無法知心本味的死屍，意謂魯迅把自己最深層的真誠都掏出來給她看了；《頹敗線的顫動》表現魯迅擔心與《現代評論》派論戰可能改變他與文學青年的關係，更是對高長虹可能也在追求許廣平的敏感；《死後》中的「火花一閃」隱喻愛情，這使已死的「我」居然起死回生。

第四部分包括從《這樣的戰士》到《一覺》及《題辭》六篇。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魯迅身染大病，一個月內四次就醫，他進入熱戀以來最痛苦的時光，這帶給他新的悲觀，他擔心肉體的衰弱將使愛情瞬間消逝，這悲觀反映在這期間的《野草》

⁷²胡尹強，《為愛情作證》，頁 112-122；130；138-140；151-173（尤其頁 169）。

⁷³胡尹強，《為愛情作證》，頁 187-195；207-212；217-220；230-231；247。

系列創作中。《這樣的戰士》中的「無物之物」是帶給魯迅無以壓力的婚外情流言，「無物之陣」是傳播這流言的社會輿論，那無論如何都「舉起投槍」的戰士自然是自喻，這時他的焦慮之所以更甚於前，正在於這些流言很大部分已成爲事實，這使戰士的反抗不再理直氣壯，陷入尷尬；《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傻子是許廣平，奴才卻是魯迅，因爲這時魯迅感到他的戀愛將以失敗告終，坐實的流言將使他落得連戰士都不是，胡尹強認爲這是魯迅「把自己靈魂中最懦怯、最陰暗的念頭展示出來」，是「防止這種結局出現的最積極、最有效的方法」；《臘葉》創作於赴山本醫院之就診後，魯迅再次思考生與死，連生命、健康都不能持久，何況愛情，正如病葉的顏色；寫於最後的《題辭》，是魯迅對婚外戀反省的總結，「生命的泥」所不生的「喬木」意指婚姻組成的合法家庭，而所生的「野草」就是婚外戀，「這是我的罪過」則寫盡了魯迅的負罪感，這野草「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才能「奪取它的生存」，意味這婚外戀的艱困與頑強，「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腐朽，火速到來」，則是魯迅特有的語彙，是堂堂正正地公開這段戀情的決心。

74

本文以爲《野草》前十一篇意義更爲重大。本文基本同意胡尹強觀點，即愛情帶給魯迅不吐不快的巨大創作動力，但舊式婚姻及啓蒙鬥士形象的雙重社會制約，使他不得不以隱語、反語來抒發這愛情，《野草》爲其集中表現；但胡氏把魯許相戀的起點定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九二四年九月中魯迅在女師大學生挽留事件中已感受到彼此的愛意，兩人至遲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兩地書》中許廣平致魯迅第一封信前半年就已情投意合，這一論點值得進一步討論：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從作於一九二四年九月的《秋夜》到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的《過客》間的十一篇《野草》，都是魯迅不知道許廣平會主動以書傳情時的作品，與《野草》其後的十二篇相較，這十一篇有更多不確定感，同時也更能反映魯迅在有名無實婚姻下的「無愛之愛」的強大意志力，以這「無愛之愛」去消融、吞嚥那似有若無、不太可能實現的男歡女愛的企圖，尤其重要的是反映了這種企圖會被真愛破壞的焦慮。

《野草》前半部首先具有母愛與男女之愛衝突的意義。第一章討論了《秋夜》中魯迅意圖掙脫母性禁制的「反斥」(abject)意涵，而由本節前一段的討論，可知這種母性禁制由魯迅對母親人格真誠的敬愛與被迫與朱安成婚的愛恨情結構成；這種禁制較諸胡尹強所謂「封建制度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禁制更爲深層，它牽涉到「母—子」間的肉身聯繫，這種聯繫化爲「母愛」終母親一生籠罩在兒子身上（如果母親先子而亡，但在魯迅那裡卻是相反），是母子雙方都不可能切斷的，魯迅對此先驗的肉身宰制的體認可從「女人天性中有母性、女兒性但無妻性」一語得到印證；魯迅原已決定承擔無限責任，以自我犧牲與這肉身宰制奮戰一生，但情投

⁷⁴胡尹強，《爲愛情作證》，頁 254-262；267-270；274-276；320-325。

意合的男女戀情的苗頭，卻破壞了他的犧牲大計。《秋夜》中的小青蟲、小粉紅花與惡鳥、棗樹，都是魯迅犧牲經濟學性格的組成部分，分別象徵他去承擔及反抗母性禁制的意志。

《野草》前十一篇中還有一重要母題是魯迅面對男女之愛時有自卑感，這其實是無所求的「真愛」的表現形式。胡尹強正確地指出《影的告別》、《求乞者》、《我的失戀》、《過客》中都有魯迅乞求愛情但又自認不配接受愛情的意義；本文發現魯迅這種自卑感並不完全來自於師生戀、婚外戀的世俗壓力，這欲迎還拒卻是愛的真諦，甚至與魯迅的「中間物」、立足當下、否棄黃金世界的思想有直接關聯。德波頓（Alain de Botton, 1969-）曾指出，愛情是一種弔詭，「真愛」一定是單向的、無回報的（unrequited），一旦被愛對象開始回報以愛，或曰被愛者到手之後，愛與被愛雙方會開始折磨對方、自我折磨，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會有這樣的疑問：別人對我的評價為何會高於我的自我評價？我配得到別人的愛嗎？⁷⁵這種單向性格使真愛不過是永無止境的追尋，愛人只能在渴望與煩惱之間擺盪；自古西方文人都認為愛是單向的，蒙田說愛只能是追求離我而去的東西，法朗士說一個人愛已擁有之物不合常理，羅蘭巴特說愛欲僅限於追求必然得不到的東西，據此德波頓說「愛情一旦實現就會把自己燒完（burn itself out with its fulfillment），欲求之物一旦得手欲望就熄滅」。⁷⁶

德波頓對真愛的分析與魯迅對戀愛的認知何其神似。不論是「我能獻你什麼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空虛而已」的影（《影的告別》），既不布施也得不到布施、只能給予、得到「煩膩、疑心、憎惡」的求乞者（《求乞者》），回贈愛人之物永遠配不上愛人贈禮、愛人總是因此翻臉的「我」（《我的失戀》），都是戀愛者在把對象視為完美的化身之下的自我質疑，連《死火》中死火選擇「不如燒完」的「燒完」，都與德波頓的用語一樣；魯迅把這普遍情感形諸文字，雖意圖藉此克服這種質疑，但事實上卻呈現了愛情的真正面目。若將魯迅的「中間物」思想與此愛情圖像相對照，則可發現「黃金世界」不盡然是負面的：對「黃金世界」的追求與追求愛人、愛情一樣，雖必然在追到後破滅，但必然會繼續追下去，這是人的本質、人的宿命，所謂「中間物」不過是在「追求」、「幻滅」之間的再接再厲而已。循此思路，吾人似可發現魯迅「中間物」思想的弔詭：「中間物」必然以「黃金世界」的存在為前提，沒有烏托邦憧憬，也不會有腳踏實地的反抗絕望的努力；甚至可以說，「中間物」就是對「黃金世界」不斷的追求，而魯迅承擔無限責任的犧牲經濟學也是一種「黃金世界」。王曉明也看出，魯迅一九二五年特別厭惡侈談將來，但這卻是因為他對「將來」的思索愈為積極；他認為，只有「相信人生是有意義的」

⁷⁵ Alain de Botton, *Essays in Love*, Picador, 1994, pp.62-63.

⁷⁶ de Botton, *Essays in Love*, pp.60-68.

人才會宣告「人生沒有意義」，「不信『將來一定更好』」的「不信」，也就表現出對將來的另一種判斷，像魯迅這種人，總需要一個關於將來的說法，以為自己的行動依據。⁷⁷

愛的這種單向性格在《野草》裡還有另一相反的表現形式，就是「玉石俱焚」。《過客》中過客說他倘受到誰的布施，就要「就要像兀鷹看見死屍一樣，在四近徘徊，祝願她的滅亡，給我親自看見」，胡尹強說兀鷹是魯迅自喻，死屍喻許廣平，他以她為美食，並稱這是魯迅自曝內心「最可怕的血肉」，這其實正是愛情的單向性格的反面表現—過客隨後就說：「或者咒詛她以外的一切全都滅亡，連我自己，因為我就應該得到咒詛。」「吃掉愛人」「或者」「為愛人死滅」，二者必居其一，沒有中間的妥協，這就是真愛，就是德波頓所謂「渴望與煩惱間的擺盪」。

《野草》後半部的十二篇則更加發揮了這種愛情的單向、無回報思想，如果說前十一篇表現的是愛情企求「可能」徒勞無功，後十二篇則表現愛情「必然」失敗，魯迅企圖藉這樣反語式的書寫，來戰勝這一「必然」，並展現出遠超過男女戀愛的本體論趣味。《死火》後以「我夢見」開頭的六篇寫夢境的篇章，其共同母題就是「夢魘固可怕，但醒後的現實人生更殘酷」。《狗的駁詰》做夢的「我」逃出受狗駁詰的夢境，但卻落得「躺在自己的床上」，必須再度面對醒著的人生中更大的苦境；《失掉的好地獄》中，人類治下的地獄之所以更屬於魔鬼，「人類」的世界所以比地獄更痛苦，就因為其「現實」，地獄真正的完成是在人間；《墓碣文》「扶心自食……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後……其心已陳舊，本味何由知？」那「心的本味」就是黃金世界，就是愛情，其「何能知」、「何由知」就是它永遠不可得，永遠都只在於「未來」或「過去」中，永遠不會成為「現在」；《頹敗線的顫動》中，為養育女兒賣身的母親寄望「現在」的痛苦在「未來」減輕，但「未來」卻迎來女兒的忘恩負義。這些篇章絕決地刻畫了黃金世界破滅的必然，正是對愛情的單向性的確認，但也是對自居「中間物」具有與黃金世界等同的終極意義的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德波頓討論愛的單向性時提到「馬克思主義」，這或許可視為魯迅後來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線索。馬克思把兩性關係視為人與人關係的根本，他在《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自然、必然的關係就是兩性關係（the relation of man to woman），在此關係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是「人與人的關係」，由兩性關係可看出人的發展程度，可看出人在多大程度上是作為「類存有」去完成他自己、理解他自己的（how much man as a species-being, has come to be himself and to comprehend himself）；兩性關係表明在何種程度上個人的自然行為已成「人的」行為（man's natural behavior has become human）、「人的本質」對他已

⁷⁷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頁 104。這種邏輯其實正是魯迅的邏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曾有精彩的比喻。

成自然本質（his human nature has come be natural to him）、個人的需要已成「人的需要」（man's need has become human need）。⁷⁸這裡相對於「個人」（man）的「人」（human），即是魯迅「立人」中的人，所謂「類存有」很接近魯迅早年曾思索過的「理想人性」；恩格斯也指出，「人與人之間的，特別是兩性之間的感情關係，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性、友愛、捨己精神」等是「人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傾慕為基礎的關係」。⁷⁹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馬、恩那裡，兩性關係正是表現理想人性的指標，人唯有在兩性之愛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自然、最真誠，人的自然潛力（馬克思的『生產力』）、社會潛能（馬克思的『生產關係』）才能發揮到極致，亦即人在戀愛時，會願為愛人付出一切，一方面包括自己的體力、腦力、心力，另一方面包括自己的人脈、社會關係。

我們可以用魯迅在女師大事件前後的經歷來為馬、恩的兩性觀作一註腳。胡尹強分析，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魯迅與許廣平開始在課堂外接觸，隨後發展出師生關係以外的思想夥伴乃至戀愛關係，魯迅的愛情世界首度被激活，使他的創作力發展到高峰，至一九二六年底，寫出了《彷徨》、《野草》、《華蓋集》及續編、《朝花夕拾》、《故事新編》的《鑄劍》、《奔月》，及《墳》的十六篇雜文；⁸⁰其中包括與「現代評論」派就女師大風潮、三一八事件展開長達一年的筆戰，一九二五年五月底陳西滢在《現代評論》發表《粉刷毛廁》，暗指女師大風潮是魯迅七人（所謂『某籍某系』）挑起後，魯迅立即以《並非閒話》一文反擊，揭穿陳西滢「公允」面貌底下的「偏袒一方」，此後一年魯迅本人計發表相關論戰文章二十一篇。⁸¹這可視為「生產力」的解放。在「生產關係」方面，魯迅對與許廣平有關的社會關係的經營可謂不遺餘力：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楊蔭瑜將許廣平等六位自治會學生開除後，魯迅即向許廣平表示教員中也應該發表宣言，說明事件真相，⁸²遂於五月中起草《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支持學生，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棻、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二十七日在《京報》發表，駁斥楊蔭瑜

⁷⁸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Christopher Pierson ed., *The Marx Reader*, UK: Polity Press, 1997, p. 73.

⁷⁹ 轉引自陳漱瑜，《丘比特與繆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的情與愛叢書》總序》，見馬蹄疾，《魯迅新傳》。

⁸⁰ 胡尹強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魯迅發表《娜拉走後怎樣》演講為魯許交往的開端，認為遠在《兩地書》中一九二五年三月許廣平寫給魯迅的第一封信之前，兩人就已很有默契與感應，《破毀鐵屋子的希望》，頁 73-91。

⁸¹ 據陳漱瑜主編《魯迅論爭集》上卷目錄。

⁸² 《兩地書·二二》，《全集》第十一卷，頁 75。

《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⁸³自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起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止，魯迅除教學外，共出席維持女師大校務的相關會議共三十二次。⁸⁴

本文並非主張魯迅這段間的創作與勞動完全由他的戀愛所驅動，本文意圖指出的是：魯迅在戀愛中體驗到人性的潛能，體驗到「犧牲之樂」，使他得以致力於「非異化勞動」。我們在魯迅這段期間看到他真正的「放鬆」、快樂，真正不帶其他目的的「遊戲」，這種放鬆與上述那些緊張的勞動互為表裡，前者為後者蓄積動能。一九二五年六、七月間，魯迅與許廣平交換了幾封遊戲情書，內容反映兩人已發展出跨越既有世俗社會關係的情感聯繫，舉例如下：

且夫天下之人，其實真發酒瘋者，有幾何哉，十之九是裝出來的。但使人敢於裝，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罷。然而世人之裝醉或發瘋，大半又由於倚賴性，因為一切過失，可以歸罪於醉，自己不負責任，所以雖醒而裝起來。但我之計劃，則僅在以拳擊「某籍」小姐兩名之拳骨而止，因為該兩小姐近來倚仗「太師母」之勢力，日見跋扈，竟有欺侮「老師」之行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維教育也。（六月二十八日魯迅致許廣平『訓詞』）

嫩弟手足：．．．「專擅」云云，只准限於文稿，其他事項，自有愚兄主張，一切毋得濫為妄作，否則「家規」猶在，絕不寬容也。嫩弟近來似因嬌縱過甚，咄咄逼人，大有不恭之狀以對愚兄者。．．．姑念初次，且屬年嫩，以後一日三秋則成長甚速，決不許故態復萌也，戒之念之。（七月十三日許廣平致魯迅）

七月十六、十七兩日，魯許互相致書為對方速寫，極盡情人戲謔能事：

「嫩棣棣」之特徵：1．頭髮不會短至二寸以下，或梳得很光，或炮得蓬蓬鬆鬆。2．有雪花膏在於面上。3．穿莫名其妙之材料之衣，或則有繡花衫一件藏在箱子裡，但於端節偶一用之。4．嚷；哭．．．（未完）（按：原文如此）．．．肅此布復順頌 嚷社．．．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七點二十五分八秒半。（七月十六日魯迅致許廣平）

「嫩弟弟之特徵」：A．想做名流．．．B．（冬秋春）有紅色絨襪穿於足上。C．．．或有蟒袍洋服多件在箱子裡，但於端節．．．則絕不敢穿。D．總在小鬼前失敗，失敗則強詞奪理以蓋羞。「嚷哭」其小者，而「窮兇極惡」則司空見慣之事。E．好食辣椒，點心，糖，煙，酒．．．F．一聲聲叫娘，娘，猶有童心。G．外兇惡而內仁厚的一個怒目金剛，慈悲大士。．．．

⁸³ 見《魯迅年譜》第二卷，頁 207-214；陳西滢《粉刷毛廁》見《魯迅爭論集》上卷，頁 151-152。

⁸⁴ 包括學生自治會兩次，「校務維持會」十五次，教務委員會二次，評議會議三次，筆者據《日記》統計，見《全集》第十四卷，頁 546-613。

（七月十七日許廣平致魯迅）⁸⁵

魯許二人的戲謔情書顛倒了性別、輩份，這是真正放鬆後才會有的解構。這解構一開始由魯迅無意間發起，日後卻成為兩人默契的符號。魯迅回覆許廣平的第一封信中就稱許為「廣平兄」，許廣平以為是「遊戲」，魯迅解釋說是「自己制定」的成例，其意不過「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⁸⁶因此許廣平在兩人漸生戀情後，索性假戲真作，調侃、挑逗起來。魯迅這邊，則一面聽許戲謔，一面還以戲謔的「師道」面孔，把自己打扮成自己批判的對象，十足潑皮化。就魯許兩人關係言，這種正常關係的顛覆是兩人真正的推心置腹，足以穿透師生、長幼、男女等既有的社會關係範疇，具有它自己的生命；這種解構托胎於魯迅微言大義的特殊筆法，從上述胡尹強的《野草》分析可知，魯迅擅用顛覆性符號來反襯自己的真實心意，如最駭人但也最精彩的以兀鷹自喻、以死屍喻愛人；這種別具顛覆生命力的筆法影響到許廣平，許在一九二五年底寫了一篇小說《同行者》，人稱魯許兩人愛情的誓約宣言，描寫一對戀人因為思想接近而相愛，她就有意把男女顛倒，「她」有與其說是「遺傳得來的劉伶癖，無寧說是由憤世嫉俗的一種反抗的驅迫，使她不時的沉緬於杯中物」，「他」則勸「她」戒酒；⁸⁷許廣平不久又作《風子是我的愛》，以「風子」喻魯迅，而「風子有一個劫運，就是在上古的時候，人們把它女性化了！說它是『風姨』，然而我則偏偏說它是風子。」⁸⁸魯許二人互相顛倒乾坤，雖然有避人耳目的「私典」用意，但自有其顛覆既成體制的「嘉年華」本質意義。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魯許頻密交換情人戲謔嬉笑書信的時間，恰好在許廣平遭楊蔭瑜開除與魯迅開始全力為維持女師大校務奮鬥之間。許廣平於五月九日被開除，魯迅於五月底展開與陳西滢的論戰，八月赴女師大參加維持會十二次；我們可以說，魯許二人在六七月間的戀人絮語，在時間與邏輯上，都可說是魯迅對外爭取正義作戰的精神動力，他與戀人的對話不但是他徹底放鬆、休息的時機，她也是他面對敵人時、舉世毀之時唯一了解他的心靈，她是他呈獻戰果的對象，她是他畢生理想的縮影；魯迅的戀愛與他改造國民性志業的關係，有如後來他所說的戰士「不可歌可泣的日常生活」與其「可歌可泣的戰鬥」的關係—日常生活並不可歌可泣，但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⁸⁹魯迅後來對許廣平說：「我要好好替中國做點事，才對得起你．．．除母親外，你是我唯一的親人，我愛你，我只愛你一個

⁸⁵ 引自王得后，《《兩地書》研究》頁 42, 45, 52-55。

⁸⁶ 《兩地書》二、三、四、五，《全集》第十一卷，頁 13, 17, 19, 22。

⁸⁷ 馬蹄疾，《魯迅新傳》，頁 124-125；原文見許廣平，《同行者》，《風子是我的愛》，《許廣平文集》第一卷，頁 4，105。

⁸⁸ 《魯迅新傳》，頁 125。

⁸⁹ 《且介亭雜文末編·「這也是生活」．．．》，《全集》第六卷，頁 602-603。

人！」⁹⁰魯迅此語雖出於一九二七年，但不過是一九二五年七月戀人絮語的延續，這裡「爲（替）中國做事」已成為他愛她的手段，「她」就是「中國」，「兩性之愛」與民族之愛已分不清孰主孰從。

我們在這裡看到，魯迅的接受馬克思主義與他對男女之愛的體會，有一隱晦但關鍵的內在關聯性。魯迅對愛的單向性、犧牲性格的體證，對女性身體蘊藏著人性光輝的發掘，與馬克思對男女之愛體現整全人性潛能的想法，是相通的；魯迅與許廣平的戀愛，是他對女性之愛的親身體驗，女師大風潮與「三一八事件」則使他把兒女私情、兩性關係與大時代的政治社會問題相結合，從女性驚人的愛的能量中看到「受壓迫和損害」的「弱者」那裡的反抗潛能。這是馬克思的人性論與階級鬥爭論接軌之處，也是魯迅的愛情觀與階級論的接軌之處。

譚德晶則從更寬廣的角度證明了這一點，他看到「三一八事件」後魯迅即明顯、激烈地向左轉，其表現有二，一是「三一八」後魯迅前所未有地連續集中發表反映現實政治問題的雜文（收於《華蓋集續編》），二是他開始購買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包括《無產階級藝術論》、《新俄國宣傳手冊》、《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和實踐》、《無產階級的文化》、《托爾斯泰與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與法理學》等。⁹¹胡風認為，魯迅一開始就有「階級」觀念，待見到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事實後，就相信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⁹²譚德晶同意胡風的看法，並進一步點出魯迅的階級觀源自一種對「弱者之愛」，這又受到章太炎的影響：章氏認為人的道德與地位、財富恰成反比，他曾把社會上所有人畫為十六個等級，以地位最低的農人的道德最高，指出「知識愈進，權位愈伸，則離於道德也愈遠」，章氏又指出，愚夫愚婦「崇拜鬼神，或多妖妄，幸其蒙昧寡知，道德亦未甚墮壞，死生利害之念，非若上流之學者之迫切也」；⁹³魯迅早期《破惡聲論》就有類似看法：「澆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膚薄之功利是尚，驅殼雖存，靈覺頓失，．．．墟社稷毀家廟者．．．鄉曲小民無與。僞士當去，迷信可存．．．」譚德晶認為，這種道德與社會階層成反比的觀念貫串魯迅一生，除在多篇雜文明確表述外，⁹⁴更悠婉地表現在小說中；魯迅小說

⁹⁰ 《魯迅新傳》，頁 153。

⁹¹ 譚德晶引自陳根生，《魯迅名篇問世以後》，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 116；見《魯迅小說與國民性問題探索》，頁 356。

⁹² 胡風，《魯迅先生》，《魯迅回憶錄》（散篇下），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 1391；轉引自譚德晶，《魯迅小說與國民性問題探索》，頁 338。

⁹³ 見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答鐵錚》；轉引自譚德晶，《魯迅小說與國民性問題探索》，頁 340-341。

⁹⁴ 如《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歐戰時候．．．儒者們引爲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勞工！」《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老百姓雖不讀書，．．．但能從大概上看，明

人物的德性可分為三類，最壞的是有錢又有些學問的紳士階層，次壞的是沾染壞習性、托庇於上層的較低賤的人，最有道德的反而是最低賤、最被人瞧不起人，這些多半是女性。⁹⁵

若進一步聯繫魯迅的戀愛經驗與上述對弱者的同情，我們可發現這段時期魯迅的基本人生觀「犧牲經濟學」得到更繽紛、多元的表述。王得后也把魯迅的戀愛—婚姻觀總結為「犧牲論」，這是一種「以所愛者的幸福為幸福，以所愛者為中心的婚姻觀，是極其嚴肅和理智的婚姻觀，它在最富有激情和衝動的兩性關係中加入了最自覺的責任感，不僅與杯水主義絕對對立，而且排斥任何兩性關係中的浪漫蒂克。．．．『犧牲論』是植根於最大最深的愛，當『犧牲論』者相信自己的愛情不致於給對方帶來犧牲的時候，他（她）愛起來是什麼也不顧的。『犧牲論』是人生觀成熟的標誌，這是認識了人生而自覺到個人對社會、對人生所負的責任的副產物。」⁹⁶這「最大最深的愛」之所以為「最大最深的愛」，所以是真實的「人」的愛，就在於在其實踐過程中勢必面臨挫折、失望、懷疑、無以為繼，但還要愛下去，反過來說，最深沉的失望、懷疑與無以為繼感，也必然是付出過最大最深的愛之後才會有的感受；後者由前者發動，後者是前者的表徵，兩者必然並存—不曾付出過愛的人不會失望，不曾付出過最大最深的愛的人不會絕望。整部《野草》就是這愛／恨一體的彩妝，本文以為《失掉的好地獄》別具代表性，魯迅在此對「人」的目的性開始質疑，幾乎已走到推翻早年「立人」論的邊緣，已近禪宗的「無立足境」：對來者的幻想（天堂）不實際，往者的痛苦（地獄）亦已矣，僅存的人間（現在），但人的世界更為殘酷，如此一來過去、未來乃至現在都已崩解，人的精神、肉體的存在基礎已全部掏空，「人」將如何自處呢？本文最後說「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似乎只能化身為惡鬼、野獸、潑皮，在這毫無出路的世界搗亂「自持」。這有如「嘉年華」式的人格，其背後是如無底洞一般的本體論縱深。

最後想討論一下魯迅對許廣平的依賴，這是魯迅肉體生命意識發展的關鍵性養份。許廣平對魯迅言有如土壤對花的關係：魯在愛情彷徨時由許作決定，到上海後，魯迅也不樂意許出去工作，而希望她留在身邊協助他。這裡可看出在魯迅的生命實踐經驗中，男女戀愛確實是融合理性、感性，意志力、判斷力的肉體生命經驗。

魯迅通過與許廣平的戀情表現出的「愛情的奔放力量」，與通過與朱安、與母親的關係表現出的「愛情的壓抑力量」，展演了生命力極致發揮的兩個面向，這兩

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絕非清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自信力的有無，壯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見《魯迅小說與國民性問題探索》，頁 341-342。

⁹⁵《魯迅小說與國民性問題探索》，頁 340。

⁹⁶王得后，《《兩地書》研究》，頁 349。

個外貌既相悖又互補的現象，實則統一在「愛情——生命力」這個內核中。這兩個現象都要求絕大的意志力、毅力、勇氣，唯有生命力的無盡發揮，才能終底於成；魯迅唯有在傳統禮教上能潔身自持，事母以孝、待髮妻以忠以敬，才能在追求真愛上不顧一切與愛人相濡以沫。

三、「不讀中國書」

魯迅在二〇年代中期的思想變化，另一表現是以「不讀中國書」論為起點形成的「本質直觀」策略。梅洛龐帝指出，事物的純粹本質（the pure essence of things）只有在面臨「全盤改變」（total variation）的企圖時才會顯露，這本質就是那些一旦改變或失去時就會毀掉該事物的元素；所謂「本質直觀」（eidetic intuition），就是首先與事物保持一定距離，把事物完全置於吾人的「凝視」之下，讓自己與該事物進入想像中的透明狀態，把支撐的基礎全部抽掉，撤到「空無一物」的最底端；⁹⁷亦即解放想像力，想像該事物可以去掉多少元素而不致崩潰、不再是它自己。⁹⁸用中文語境的「疾風知勁草、板蕩見忠臣」一語為喻，事物的本質就是「勁草」與「忠臣」，這些本質只有在面臨「疾風」、「板蕩」等這類危急存亡的「全盤改變」的挑戰下才會顯現。我們若由此後設的立場看，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極端，幾乎臻於對中國傳統的全盤否定，其實是在進行一場「全盤改變」的文化實驗，在想像中把中國傳統文化推向毀滅的邊緣，藉此讓中國文化中的純粹本質自然透顯出來。「不讀中國書」論則是這種策略的典型。

一九二五年初《京報》副刊編輯孫伏園請文化界名人開「青年必讀書」書單，魯迅藉此提出驚世駭俗之論曰：「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⁹⁹這一怪論引起軒然大波，延續數月。

魯迅此論出後，記有柯柏森、熊以謙、可嘆、趙雪陽、郝廣盛、袁小虛、張空空、瞎嘴等人致書魯迅或孫伏園，予以質問，論點主為「中國人不看中國書是笑話」（張空空）¹⁰⁰，「不能因為自己不懂中國書就說中國書都不好」，「中國書都是入世的」、「行也要學來輔助」（熊以謙），¹⁰¹「連外國人都重視中國書」（可嘆）

⁹⁷ Merleau-Ponty,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p.111.

⁹⁸ 索科羅斯基，《現象學十四講》，頁 258。

⁹⁹ 《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¹⁰⁰ 張空空，《真是偏見的經驗》，《魯迅論爭集》上卷，頁 121。

¹⁰¹ 熊以謙，《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收於《集外集拾遺》，《全集》第七卷，頁 255-259。

¹⁰²，「五胡、回紇、滿洲人都讀中國書、同化於中國」（熊以謙），最多的批評是「讀外國書是賣國、會成亡國奴」（熊以謙，柯柏森，袁小虛）¹⁰³。在這些批評中，魯迅只回信駁斥了柯柏森、熊以謙，他的論點是：他的「不讀中國書」是寫在「附註」欄，故並無指導青年之意，批評他不懂中國書的人自己更不懂，願與外國以賓主相待而不忍再像五胡至清那樣「先以主奴而後同化」，針對「亡國論」，他以「說外國話不等於愛國」、「國之存亡在政權不在語文」反駁其邏輯不通；¹⁰⁴他還以喝酒傷身為喻，把讀中國書比作喝酒，有害健康¹⁰⁵。

魯迅的反駁僅「破」而未「立」，並未進一步闡釋何謂「僵屍的樂觀」、「活人的頹唐和厭世」，「言」與「行」的關係。孫郁把魯迅此論定位為「中西文化之爭」，旨在「喚起人們重建新的生活」；¹⁰⁶房向東認為，魯迅出此驚人之語有兩種用意，一是指桑罵槐，名為罵中國「書」但實際是指向復古派的「人」，二是「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就像他曾說中國人是中庸的，說要在鐵屋子開個窗，衛道之士絕不允許，但要把屋頂掀掉，他們就會同意開窗，「不讀中國書」目的本是提倡多讀外國書，利用中國人這調和折衷傾向，自然會走上調和之路，達到多讀外國書的目的。¹⁰⁷這些論點都很有道理，本文擬從現象學的角度加以綜攝。

本文認為魯迅此語的深層用意是在進行現象學式的「本質直觀」，把支撐中國人文化生命的基礎抽掉，逼迫中國人面臨崩潰、不再是自己的地步，藉此讓中國人的民族生命本真透顯出來，又迫使中國人以此生命本真去參與、學習、進而改造生活世界，同時也藉此創造自己，這就是魯迅的所謂「行」。由此進一步言，「少或竟不讀中國書」並非只要我們改去「多讀外國書」，而是要扯掉「書」或「言」這隔開「人」與「生活世界」的「我思」障礙，直接走到生活世界去接受挑戰，在其中找回「我能」。接受挑戰就是「行」，就是戰鬥。人唯有通過生活世界的挑戰、在生活世界中戰鬥，才能盡性，才能像尼采所說的「創造高出於自己之物」（to create beyond yourselves）¹⁰⁸，才算真正作為人存在。

這裡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行」、戰鬥與「死」的關係。魯迅說讀中國書就像喝酒一樣會傷身，但這兩者都是魯迅自找的，他自承喝酒是「帶些自暴自棄的氣味」，

¹⁰² 可嘆，《致柯柏森、熊以謙》，《魯迅論爭集》上卷，頁 117。

¹⁰³ 柯柏森，《偏見的經驗》，收於《全集》第七卷，頁 250；袁小虛，《為中國書打抱不平》，收於《魯迅論爭集》上卷，頁 119。

¹⁰⁴ 《集外集拾遺·聊答「……」》及《報《奇哉所謂……》》，《全集》第七卷，頁 248, 253-254。

¹⁰⁵ 《集外集拾遺·這是這麼一個意思》，《全集》第七卷，頁 263。

¹⁰⁶ 孫郁，《少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導言》，《魯迅論爭集》上卷，頁 103。

¹⁰⁷ 房向東，《魯迅與他「罵」過的人》，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64-65。

¹⁰⁸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部，頁 42。

抄古碑、讀古書也是為「麻醉自己的靈魂」¹⁰⁹，這兩者一身一心，都是「往死裡」幹。這死、存在的不可能性，似乎是啓迪魯迅面向生活世界的啓蒙者，魯迅在用酒與中國古書麻醉自己的身體與靈魂的過程中，在主動趨向死亡的過程，同時感受到人的生命本真進入生活世界的價值。換個角度看，「死」作為生存的最大威脅，是「戰鬥」的真諦，生命若不受威脅其實算不得戰鬥，凡戰鬥必有送命的可能性，只有當死亡張著大口等在一旁時，人的潛力才能真正發揮；這是人進入生活世界的代價。在這樣的戰鬥狀態中，是無所謂喜怒的，戰鬥就是一切。這裡便可看出魯迅與毛澤東的差異。毛曾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也就是毛在戰鬥時是「樂」的，但在魯迅那裡，戰鬥是「必須」的，人不戰鬥就活不下去，人生來就是為了戰鬥，在戰鬥時的心情無所謂喜怒哀樂。

魯迅同時期曾借用醫學上以酸性劑防止組織硬化之法，從另一角度說明這種「本質直觀」策略。一九二五年底，教育總長章士釗主張「讀經救國」，要求小學生讀經，魯迅的反對意見可說是「不讀中國書」論的進一步闡釋；他指出，歷來讀書人很少實踐書中的教訓，真正實踐書中教訓的反而是不識字的節婦、烈女、工人，而提倡讀經的人分兩種，一種是誠心讀經、真相信讀經可救國的笨牛，一種則是從經中悟出「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又能「假借大義，竊取美名」之方的聰明人，這些聰明人才是現在提倡讀經者的真面目；魯迅最後把只知墨守的古國比喻為廢料堆積愈多的衰老人體，舊習慣教養使之日漸僵化、無法適應新環境，正如人體組織日益硬化，古國中很多人被壞經驗教養得自私自利，恣意妄行，則猶如原來養衛人體的「遊走細胞」逐漸變得只顧自己，蠶食組織，變成「大嚼細胞」，使整體趨向滅亡；俄國有位醫學家主張用酸性劑撲滅這些細胞，人體才能免於老化，魯迅也認為用「強酸劑」撲滅這些恣意妄行者是唯一的藥方。¹¹⁰

這裡可清楚看出，魯迅反對的重點不在於「讀經」一事，而在於「藉讀經以取巧」這一「言行相悖」的事；他對真正實踐了經書教訓的婦女勞工決無不敬之意，與他勢不兩立的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偽君子，這些偽君子沒有「行」可言，他們沒有實踐，他們不與生活世界接觸，他們只「讀書」，蠱惑老實人（笨牛）進入生活世界，有功則自居指導之功，有過則由笨牛們承擔。這種看似「無入不自得」的處世之道其實是自取滅亡的封閉，為了重生，必須壯士斷腕，把這些「大嚼細胞」及其所依恃的「經」（中國書）一齊拔除，因為經過成本效益評估，經使用這樣的強酸劑後，折損的不過是少數「聰明人」，換回的卻是遠較多數的仍有生命力、求生能力的「笨牛」，他們掙脫「經書」的桎梏後，就能以其生命本真去學習適應新的環境，開出新的進步。

¹⁰⁹ 《吶喊·自序》《全集》第一卷，頁 418。

¹¹⁰ 《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全集》第三卷，頁 127-130。

「不讀中國書」的論調到一九三三年又再度出現。當時魯迅批判有人建議青年讀《莊子》、《文選》、學寫篆字及填詞，直指「新青年的軀殼裡，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囉」，施蛰存以為批的是他，為文聲辯，魯迅又奮袂而起，斥施為「洋場惡少」。¹¹¹這場論戰可說是「不讀中國書」論戰的翻版，不同的是，這次魯迅批判的對象不再是「學衡」派、章士釗等站在保守主義立場反對新文化的「遺老遺少」，而是施蛰存這樣受在新文化中成長的「新青年」；他這次批評的手法也迥異於前，他稱引「遺老」們追懷的光緒末年的「老新黨」，說他們三四十歲了還勉力看洋書、怪聲怪氣地學外文，又高度肯定他們這種「圖富強」「堅決、切實、認真、熱心」。時移勢易，魯迅對遺老遺少的抨擊轉為對新青年的抨擊，一以貫之主張的則是「不讀中國書」，可見他對事不對人，這「事」就是「拔掉中國傳統賴以存在的根本，讓中國在面臨失去自我之際發現其真正自我」。

魯迅這種現象學本質直觀式的思維，一直延續他的一生。本質直觀使他使他永遠感到安穩的生命現狀底下的破壞力，使他永遠「於無聲處」聽到「驚雷」，使他成為「死亡的使者」，成為摩羅、鴟鴞、惡鳥。

四、與高長虹的反目

本節最後以高長虹與魯迅的分合作結。高長虹、向培良、高歌這批「狂飆社」成員，可說是魯迅在二〇年代極為器重、悉心培養，但也是第一批與之決裂的青年，這一經歷成為魯迅一生「遭被愛者背叛」的典型，也使魯迅對「新思想者」的真實內心重新評價，影響不可謂不大，而這次事件又與魯許戀愛有關，反映了戀愛對魯迅思維的多方面影響。以下概述之。

魯迅原來相當欣賞高長虹。青年高長虹以「狂飆運動」自許，與魯迅的國民性批判可說若合符節，一九二四年冬，高長虹與狂飆社同人創辦《狂飆》週刊，送給魯迅看，其中高寫的詩描寫先覺者受民眾誤解的悲哀，與魯迅極為相應，故魯迅對高另眼相看。¹¹²一九二五年四月，魯迅與高長虹、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五人決定合辦《莽原》週刊，高仍受魯器重，據魯迅記錄，在辦《莽原》的七個多月中，高親訪魯迅寓至少五十二次，魯迅常將來信給高看，投《莽原》的稿件也會先征求高的意見，這段期間高長虹幾乎是魯迅思想的解說者、宣傳者；¹¹³一九二五年夏，《莽原》同人出版《烏合叢書》，其中有魯迅為高長虹編詩集《心的探險》；一九二六年春，魯迅為許欽文編輯出版小說集《故鄉》，竟委托高長虹寫「小引」介紹。

¹¹¹ 見《淮風月談》的《重三感舊》及《撲空》，《全集》第五卷，頁324-325，348-351。

¹¹² 董大中，《魯迅與高長虹》，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41-46。

¹¹³ 《魯迅與高長虹》，頁70, 73, 87。

隨後高長虹即轉赴上海發展。¹¹⁴

高長虹到上海後志得意滿，他擬籌辦《狂飆叢書》，意圖把北京的《莽原》、《烏合叢書》等納入，並作廣告宣稱「狂飆運動同人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此時魯迅已南下廈門，在北京接替主《莽原》的韋素園得知《狂飆叢書》的廣告後頗不滿，以致狂飆社的向培良投《莽原》的稿件被退。¹¹⁵向培良告知上海的高長虹，高則要求人在福建的魯迅解釋。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長虹作《1925 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將對魯迅的不滿合盤托出，稱魯迅「直覺力很好」但「不能持論」，魯迅只想得到「一個『思想界的權威者』的空名便夠了」，「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心身交病之狀況矣」。¹¹⁶魯迅對此怒不可遏，認為高長虹先冠他以「思想界先驅者」，又因「思想界的權威者」假冠而罵他，「不是人樣」，並決定「雖是什麼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且毫不客氣，刀鋒正對著他們的所謂『狂飆社』。」¹¹⁷即作《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新時代的放債法》、《新的世故》等文，¹¹⁸給高以譏刺，甚至直斥高有「我是青年，所以公理在我這裡」的心態。

當時又有謠傳高長虹單戀許廣平，作詩以月亮喻許廣平，以黑夜喻魯迅，但今人研究已證明這是誤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高長虹在《狂飆》週刊第七期上發表兩首題為《給——》的詩，第二首中有云：「我在天涯行走／月兒向我點首／我是白日的兒子／月兒呵請你住口……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夜是陰冷黑暗／月兒逃出在白天……夜是陰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陽／太陽丟開他走了／從此再未相見」；¹¹⁹此後北京有人結合魯許戀情傳聞，說高長虹此詩的月、黑夜分別影射許廣平與魯迅；十二月底魯迅自韋素園得知此謠後，立即覆信，並研判三種可能：一是別人神經過敏的推測，二是「狂飆社」人附會，三是高長虹真有此意，若果真如此，「則太可惡，使我憤怒……我此後倒要細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樣的夢，或者簡直動手撕碎它」；¹²⁰魯迅也真「動手」了，他隨後即信筆寫下小說《奔月》，自比后羿，以叛徒逢蒙喻高長虹，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向許廣平稱，這是「和他（高

¹¹⁴ 《魯迅與高長虹》，頁 109-115。

¹¹⁵ 《魯迅與高長虹》，頁 142-143。

¹¹⁶ 原文參考《魯迅論爭集》上冊，頁 309-312。（該書將高長虹該文誤植為《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

¹¹⁷ 《1926 年 10 月 23 日致許廣平》，引自《魯迅論爭集》上冊，頁 297。

¹¹⁸ 收於《華蓋集續編》、《而已集》及《集外集拾遺補編》，《全集》第三卷，頁 391, 498-499，第八卷，頁 147-155。

¹¹⁹ 高長虹，《給——》，收於《魯迅論爭集》上卷，頁 315-316。

¹²⁰ 《書信 261229 致韋素園》，《全集》第十三卷，頁。520。

長虹)開了一些小玩笑」；¹²¹同年十一月他在《新時代的放債法》中說：「你如有一個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他只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可見魯迅對高長虹的「單戀」之難以容忍、記恨之持久。

今人的研究已證明這是魯、高間的誤會。董大中指出，高長虹雖有單戀的對象，但不是許廣平，而是他的同鄉、當時也就讀於女師大的石評梅，高對她的愛意十分執著，除了《給——》中的月亮正是暗指石評梅外，他還著有《革命的心》小說，也是獻給石的；¹²²閻繼經也指出，這一流言製造者是誰至今不明，傳播的則有多人，韋素園當時受高長虹責問退稿事，正好藉機向魯迅傳遞這流言以爭取魯迅支持，魯迅對此是「因盛怒而一時失察」，閻氏與董大中也都指出，魯迅後來對此「失察」頗有悔意且力圖補救，如編《華蓋集續編》時有意不收較激烈《新的世故》，只收較幽默的《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一九三五年寫《《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時，特別列入不以小說見長的高長虹，並稱高是《莽原》中奔走最力者。¹²³但董、閻兩位似乎都未注意到更激烈的《新時代的放債法》被編入《而已集》中。

在魯迅與高長虹反目的過程中，本文企圖著重強調魯迅那種「犧牲反遭背叛」的心理，及其衍生對青年（或有新思想者）不信任的深遠後續效應，尤其是這兩者的關聯。錢理群曾點出魯高反目有兩點意義：一是魯迅在此感受到「強烈的『被利用』感」，稱這是繼一九二三年與周作人鬧翻後同樣性質的精神打擊，此後對他即避免盲目的、絕對的「自我犧牲」，但他的犧牲精神是貫串一生的；二為魯迅也由此注意到「封建專制主義的『故鬼』在『現代青年』身上『重現』的現象」。¹²⁴吾人認為這兩點分屬感性與理性層面，卻又是相互證成的一體兩面，這一體就是魯迅主客合一的肉體生命意識。如果魯迅沒有自束髮以來即形成的「犧牲經濟學」，就根本不會想到提攜高長虹，從而也就根本不會有機會看出「青年現代面貌下的故鬼」，也唯有在繼續服務、提攜青年，這一洞見才能獲得其實踐意義，這「理性」是來自於、植基於「感性」的；而錢理群所稱避免盲目、絕對的自我犧牲，其實是「犧牲經濟學」完成，「感性」實踐又使「理性」更趨完善。

戀愛則是這一理性、感性交融的觸媒與接著劑。如上所述，高長虹並未單戀許廣平，且魯迅與許廣平攜手南下前高已先赴上海，所以他不會知道流傳於北京的魯許戀情謠言；但在魯迅這方面，魯迅的強烈反應相當醒目，他非常在意且慎重地處

¹²¹ 《兩地書一一二》，《全集》第十一卷，頁 275。

¹²² 《魯迅與高長虹》，頁 203-212。

¹²³ 閻繼經，《重評《月亮詩》》，收於《魯迅爭論集》上卷，頁 354-370。

¹²⁴ 錢理群，《從高長虹與二周論爭中看到的．．．》，《魯迅論爭集》上冊，頁 337, 338。

理這個流言的，由他在韋素園告知此謠言後揮筆立就寫出《奔月》，又在《新時代的放債法》中作如此露骨地反擊，可見他心中的妒意、不安全感；人在戀愛時感情的強烈實屬自然，尤其魯迅這樣一個充滿熱情血性、又獨身度過四十多年的人，沒有這樣激烈的反應才是怪事；在與周作人決裂後，正如前述馬蹄疾所引，許廣平是魯迅世上除母親外唯一所愛之人，或者可說是魯迅唯一的「親人」，魯迅已將許廣平視為生命的一部分，不可須臾離；魯迅對高長虹單戀許廣平流言的過度詮釋及反應，正可證明馬克思所稱男女戀愛是「人與人最直接、自然、必然」的關係這一論斷。本文認為，我們實在不需「為賢者諱」，魯迅的過度反應實在是已「立」之「人」（human）的有血有肉的表現。由此觀之，胡尹強認為《頹敗線的顫動》的創作與高長虹有關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詩中的賣身的母親與忘恩的女兒的關係，是《野草》中唯一的「血親」關係，魯迅以這一「直接、自然、必然」的關係隱喻他與許廣平的關係，是有可能的。

我們可以說，二〇年代中期的魯迅經歷了一生最劇烈的人際關係變化：至親兄弟決裂，初次體驗男女愛情，首度經歷愛徒的背叛；這些劇變一個個推翻、否定了「現狀」，讓以批判國民性、「立意在反抗」亦即「推翻現狀」為己任的魯迅也莫名其妙了，但這「莫名」的「妙」，這名實的割裂、因果的顛倒錯位，卻是人生真諦，魯迅這段期間的書寫，其實正是如何寫出這「妙」的努力。王曉明指出，整個二〇年代中期，「無話可說」一直是魯迅的基本心態，他在這段期間的書寫，都是對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分析，以重新摸索出自己的定位，「恢復自己說話的信心，要重獲一套能說的話」，但這些努力都不成功，《朝花夕拾》的回憶文章，則宣告了這一失敗，¹²⁵此論確當；本文認為，親情、愛情的一失一得及其「妙」之「莫名」，使魯迅更加接近那超越語言的原初「符號界」，也就更接近符號界下的「死亡」，因此他以「鴟梟」、「惡鳥」自任的「死亡使者」性格更為堅定。

第四節 「五十而不惑」——擁抱左翼的痛苦與第三次自我放逐

以下本文要討論魯迅生命的第三階段：轉向左翼思想及其失敗。魯迅在廈門待不到一年，就於一九二七年一月轉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年四十七歲，此後魯迅開始「向左轉」，不僅在思想上主動接觸馬克思主義，行動上也主動與左翼人士親近。促成這一轉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從個體、內在層面看，魯迅經過二〇年中期的劇變後，他的犧牲經濟學要求他要繼續「愛」，繼續愛就要有新的著力點、切入點，在「吶喊」、「彷徨」之後，他需要再次「選擇」以確立自己的獨立自主性。有論者謂，促成魯迅思想轉變的並

¹²⁵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頁 130。

非對於某種政治立場、社會理想或哲學思想的「不信」到「信」，而是兩種不同文學觀念的衝突，即「寫外表」還是「寫內心」的文學的衝突，魯迅雖確立了文藝「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但其支撐文學的支柱仍是個體的「自心」，而非群體的「階級意識」；¹²⁶這就是看到魯迅的內在動力。

從外部因素看，如果說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事件」讓魯迅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那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黨對他則有無限衝擊。二七年九月他寫道：「我離開廈門的時候，思想已經有些改變。這種變遷的徑路，說起來太煩，姑且略掉罷，．．．單就近時而言，則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這「近時的原因」就是指使他「嚇得目瞪口呆」的清黨。另據中共方面說法，魯迅在中山大學期間，已與學生黨員畢磊、廣東區執委書記陳延年等接觸，接受《做什麼》、《人民週刊》等共黨刊物，¹²⁷應亦有使其思想進一步左傾的作用。

魯迅的具體「轉變」可歸納為下幾項：一是對「進化論」的懷疑，「四一二」清黨中他看到殺戮青年的不只是老年，還包括青年們自己，而且這些青年不顧不能再造的生命的殘忍手段，更甚過去的老人；¹²⁸自此開始，他逐漸形成了與進化論完全不同的歷史判斷：「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¹²⁹二是魯迅越來越感到「文學無用」、「文學家無用」，他心目中的創作主體從原來的知識分子轉向基層「庸眾」，鼓勵庸眾自己發聲，如他在二七年四月聲稱「平民還沒有開口．．．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砲就把孫傳芳轟走了」；¹³⁰十一月向勞動大學學生演時說：「創作方法，是寫什麼，怎樣寫的問題。我看還是首先寫人生、為人生、為改造這人生．．．怎樣寫？是複雜的問題，說起來也簡單。你有苦悶，就發牢騷；有希望，就去幻想；你痛苦了，就叫喚；看見可哭的，就寫可哭的；有可笑的，就寫可笑的；可恨的，就寫可恨的！」¹³¹

至於魯迅思想在這一階段是否有「質變」？中共主流學界向持肯定說法，認為當他一面經歷了清黨血案，一面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思想乃有「質的飛躍」，其世界觀「從革命民主主義進到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從唯物主義上升到辯證

¹²⁶ 郜元寶，《魯迅六講》，頁 39-40。

¹²⁷ 《魯迅年譜》第二卷，頁 364-365, 383。

¹²⁸ 《而已集·答有恆先生》，《全集》第三卷，頁 453-454。

¹²⁹ 《而已集·〈塵影〉題辭》，見王曉明，〈魯迅式的眼光〉，一土編，《二十一世紀：魯迅和我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 66。

¹³⁰ 《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全集》第三卷，頁 422。

¹³¹ 《魯迅年譜》，第三卷，頁 14。引文未收入《全集》。

唯物主義」，¹³²這種論斷明顯地把中共當作主體，魯迅被化約為對象，對魯迅個人的思想發展其實不具說明意義，故亦有學者反對這種觀點，把視角拉回魯迅，認為把前期魯迅理解為在謬誤中徘徊的人，是最省力但是也最愚蠢的研究，因偉大思想家的偉大正在於其性格開放、善於吸收各種思想營養，馬克思主義所以被魯迅認為是「最明快的哲學」，正是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及博覽中外思想後的判斷，因此這一判斷並不意味他拋棄了其他學說，而意味他獲得了評判各派學說的思想武器。¹³³本節將進一步說明，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其實僅基於與自己思想獨立、自身的犧牲性格，一旦落到與人共同「論述」的實處，他就顯出與這些新同仁的扞格乃至衝突了。這些衝突貫穿他整個左翼生涯，始於創造社、太陽社的攻詰，終於與周揚等人的「兩個口號」論戰，這第二次來自「同一營壘」的刀劍，更能凸顯魯迅孑然獨立的性格，在他整個生命文本中，更能成就他「承擔無限責任」的犧牲經濟學。

一、創造社、太陽社的「圍剿」：「革命文學」論戰

這是魯迅又一次同人背叛的經歷，而且似乎更無跡循。魯迅其實對創造社頗有好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還在廈門時，就向許廣平說到廣州後想與創造社聯合起來向舊社會進攻，一九二七年九月他認為中國「還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沉鐘三社」。¹³⁴但一九二八年一月馮乃超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刺魯迅「醉眼陶然」地僅能反映「落伍者的悲哀」，卻挑起了雙方一場惡鬥，史稱「革命文學」論戰。

馮文發表後，成仿吾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創造月刊》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重提「三個閒暇」，刺魯迅是「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面的小資產階級」；¹³⁵李初梨在二月的《文化批判》發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把魯迅與陳西滢相提並論，質問魯迅是「第幾個階級的人」、寫的是「第幾個階級的文學」；¹³⁶錢杏邨三月在《太陽月刊》發表《死去的阿Q時代》，說魯迅的創作「大多數是沒有現代的意味」，他不但沒有超越時代，且沒有抓住時代，他的思想

¹³²唐弢，《論魯迅的美學思想》，汪暉，錢理群編《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論魯迅（二）》，石家莊：河北人民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 71。

¹³³劉玉凱，《魯迅錢鐘書平行論》，河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112。

¹³⁴周行之，《魯迅與左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 36。

¹³⁵成仿吾一九二七年一月就在《洪水》發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批魯迅搞的是「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其背後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007；《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018。

¹³⁶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026。

走到清末就停了；¹³⁷「弱水」四月在《戰線》發表《談現在中國的文學界》，批魯迅與創造社論戰氣量狹窄，現出「『老頭子』的確不行」之態；¹³⁸批判魯迅的高潮，是化名為杜荃的郭沫若在八月的《創造月刊》上發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稱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式人物」，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諦」。¹³⁹

在魯迅這邊，他先於三月發表《「醉眼」中的朦朧》，反駁馮乃超文，繼於五月發表《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反駁弱水文。¹⁴⁰至於對杜荃的「封建餘孽」，魯迅則未針對性回應。另魯迅在一九二八年四月的《文藝與革命（與冬芬的通信）》中刺「革命文學家」只會「掛革命招牌」，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拿掉招牌後的創作就不忍卒睹；¹⁴¹八月在《文壇的掌故》中，稱成仿吾、蔣光慈、王獨清等對手「要有革命的名聲，卻不肯吃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於是「啼笑俱偽」、「左右不同」；¹⁴²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的《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中，魯迅引俄國詩人葉遂寧、小說家梭波里在十月革命後自殺，諷刺創、太社等人脫離現實，並稱郭沫若的小說《一隻手》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¹⁴³據指出，中共江蘇省委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前後，出面向創、太二社的黨員傳達中央指示，要求停止對魯迅的圍攻，準備成立新的文學團體，這場「革命文學」論戰方才告終。¹⁴⁴

即使在論戰告終、左聯成立後，戰火還在延燒。一九三〇年五月郭沫若發表《「眼中釘」》一文，雖意在宣示與魯迅盡釋前嫌，但仍聲稱「《吶喊》我是沒有讀完的」，他與創造社批判魯迅乃是批判他所代表的部分社會意識；¹⁴⁵一九三一年八月，魯迅作《上海文藝之一瞥》演講，稱創造社人對中國社會分析不夠，成仿吾擺出一副極左的兇惡臉孔，令人對革命抱著恐怖；¹⁴⁶一九三二年二月郭沫若發表《發端》，說

¹³⁷ 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031。

¹³⁸ 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038-1039。

¹³⁹ 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074。

¹⁴⁰ 均收於《三閒集》。

¹⁴¹ 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113-1114。另見《三閒集》。

¹⁴² 《三閒集》，《全集》第四卷，頁 122。

¹⁴³ 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128。另見《三閒集》。另《魯迅論爭集》下卷蒐整魯迅論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爭的文字得十九篇，見該書頁 1151-1156。

¹⁴⁴ 房向東，《魯迅與他「罵」過的人》，頁 244。周行知引用陽翰笙回憶，亦認為論戰的結束係因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直接介入，見《魯迅與左聯》，頁 57；夏衍則認為周恩來亦介入阻止，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150。

¹⁴⁵ 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085-1086。

¹⁴⁶ 《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全集》第四卷，頁 297。

魯迅先前帶有虛無主義傾向，把創造社的「窮小子」化成鴛鴦蝴蝶，他可高呼「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萬歲」。¹⁴⁷

魯迅與創造社的矛盾，除個人恩怨外，有深層的社會文化基礎。胡風在與魯迅交往之前，曾在上海見過周揚與馮雪峰，當時他就感到魯迅與創造社在思想上的對立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且就反映在馮雪峰與周揚的對立上。¹⁴⁸王富仁還指出，魯迅與創造社的對立是一種「中年文化」與「青年文化」的對立，他認為中國文化雖有很重的老年文化色彩，但儒家、法家則是中年文化，其特色是重社會實踐，五四運動也是一場由當時已屆中年、有固定職業的文化人推動，創造社卻是這整個中年文化中的異數，因為它從二〇年代創社起，就是以充滿熱情但欠缺社會歷練的青年主導的，他們以純粹青年的自信與坦誠異軍突起，三〇年代他們在與中年文化的對立中向中年文化轉變，尤其他們新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屬於中年文化，深具科學性與實踐性，他們青年的優勢喪失，創造社在革命文學論戰後就結束了生命。¹⁴⁹其實王富仁這裡所謂「中年文化」的特色，很接近本文的肉身意識，王氏說，只有像中年人那樣始終無法擺脫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責任感的人，對社會的觀察與感受才可能深入、細緻及統一，才能深入社會和人的肺腑去理解；¹⁵⁰這正是現象學中個體與生活世界意向弧的肉身聯繫，人唯有在超越語言文字的層次與世界產生互動，才能真正完成「人」的發展。以下我們就要探討魯迅對與創造社論戰的焦點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二、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

以下我們要探討魯迅以他獨特的認知架構，在馬克思主義這個龐大的論述體系中截取到的成份，我們將看到，這些成份是戴上新面具的肉體生命意識。

魯迅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時間很早。一九〇六年留日期間，魯迅就購買了堺利彥主編的《社會主義研究》雜誌，這是日本最早的專門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刊物。¹⁵¹第三節述及，一九二八年三一八事件後魯迅明顯左傾，當年他購買的社會主義論著有：《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列寧論中國革命問題》、《共產黨宣言》、《恩格斯婚姻及家庭的發展過程》，還有《俄國工人黨史》、《階級鬥爭理論》、《唯物論與辯證法的基本概念》、《唯物史觀解說》、《文學與革命》、《無產階級文學理論》、《蘇俄的文藝政策》、《新俄國文化的研究》等。¹⁵²一九二八年十

¹⁴⁷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140-1143。

¹⁴⁸ 林賢治，《人間魯迅》下冊，頁 855-856。

¹⁴⁹ 王富仁，《歷史的沉思：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論》，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226-253。

¹⁵⁰ 王富仁，《歷史的沉思》，頁 240。

¹⁵¹ 《魯迅年譜》，第一卷，頁 180。

¹⁵² 《魯迅年譜》，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增訂版，頁 99。

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魯迅用日本神永文三著的《馬克思讀本》為課本，繼續教許廣平學習日文。據許廣平回憶：課本「除序文而外，內容共分十講：一、馬克思的生涯及事業；二、唯物論辯證法；三、唯物史觀；四、階級鬥爭說；五、馬克思主義與國家；六、勞動價值說；七、剩餘價值說；八、資本積蓄說；九、利潤說；十、資本崩潰說。」¹⁵³

魯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除了文本的吸收外，對蘇聯十月革命的看法也是重點。前節述及，魯迅對十月革命使某些文學家的理想破滅印象深刻，他至少在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初兩度舉葉遂寧與梭波里之例，指出革命必然粉碎這些革命詩人的理想，否則不算真革命，而這些詩人的理想若不被粉碎，甚至不「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碑上」，就不算「真實」，葉、波在十月革命後自殺了，因為「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以此說明：凡「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¹⁵⁴李歐梵認為這意味魯迅看到了文學與革命之間有著變化的、複雜的、活生生的關係。¹⁵⁵本文以為，這一以死／真實／革命三者聯繫起來並互為條件的觀察法，是魯迅看待十月革命，以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

自被創、太社「擠」去閱讀乃至翻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後，魯迅接受、認同的馬列文論及文學作品，多為托洛斯基、沃隆斯基（Alexander Voronsky，魯譯瓦浪斯基）、「同路人」等較非正統、較富「自由」美學色彩的著作，他雖然翻譯了普列漢諾夫與盧那卡爾斯基的論著，但他接受的部分也是他們思想中較對立、矛盾的面向，而非一元化、決定論的部分。

魯迅從普列漢諾夫研究原始藝術的文章中，學到藝術與勞動間的原始聯繫，由此他指出，社會觀察事物最初是從功利觀點出發，後來才移到審美觀點的，美的享樂的、愉悅的根柢，必然伏著功利，人類以為美的東西，就是對他為生存而與自然及他人的鬥爭有意義的東西。¹⁵⁶李歐梵認為魯迅並未看出或有意忽略「功利」與「審美享受」兩者完全不相容，也未看到普列漢諾夫認為「為藝術而藝術」與唯物主義相容的內在悖論，從而指出魯迅吸收的是普氏最僵化、決定論的一面。¹⁵⁷本文對此殊為不解。「功利」與「審美」的統一是早已解決的問題，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

¹⁵³ 《魯迅年譜》，第三卷，頁 99。

¹⁵⁴ 《三間集·在鐘樓上》，《全集》第四卷，頁 36；《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全集》第七卷，頁 119。

¹⁵⁵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頁 207。

¹⁵⁶ 《二心集·《藝術論》譯本序》，《全集》第四卷，頁 262-263。另參考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頁 215-216。

¹⁵⁷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頁 216-217。

就引用貝爾（Clive Bell）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概念，提出審美是內容「積澱」為形式的命題，指出舊石器時代對顏色、新石器時代對線條的審美感受，都以當時的物質生產為基礎，美感的積澱是通過生產勞動及生活活動中掌握的自然法則而實現的。¹⁵⁸魯迅之所以能接受「功利」與「審美」統一的觀點，其基礎正是李氏所謂「生產勞動」及「生活活動」，亦即本文的「生活世界」，魯迅之所以「並未看出或有意忽略」功利與審美的矛盾，正是因為對他而言生活世界的「現實」足以統轄兩者。他早年對美術的定義，就透露出這樣的統一，他既認為「美術誠諦，固在發揚真美，以娛人情，比其見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但也基於中國現實，指出美術有「表見文化」、「輔翼道德」、「救援經濟」的功能。¹⁵⁹

盧那卡爾斯基是魯迅翻譯的蘇俄評論中比重最大的一位，魯迅也從盧氏著作中更了解自己。¹⁶⁰魯迅對盧那卡爾斯基的把握，也反映了他的現實感。盧氏自認立場較普列漢諾夫持平，相較於普列漢諾夫在藝術與社會關係問題上偏重「經濟決定論」，盧氏則偏重於意識形態的能動性這部分，主張個人不僅僅是歷史的載體，強調藝術家的主體性和參預性，對歷史的積極的推動作用；早在十月革命前，盧氏就已對普列漢諾夫機械唯物論式的理論不表苟同，認為普氏嚴重忽略「科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感情和倫理的方面」。¹⁶¹盧氏也認為俄國革命後應繼承資產階級的舊文化，魯迅則據此加以發揮稱，新階級、新文化並非從天而降，也要於舊文化有所取捨；李歐梵稱，魯迅基於其天賦洞見，把握到盧氏的另一重要思想，就是「藝術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必得完全自由」，但在階級社會裡卻「不能不暫有禁約」；盧氏又指出，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應去認識「一眼看來太普通、太遙遠，但在仔細觀察後卻是對社會生活發揮影響的問題的巨大意義」，不應只把某些作品打為資產階級現象而不顧，應對其「潛在用處」作出新評價。¹⁶²

魯迅在盧氏那裡，更多看到的是深植他心中的主客合一的肉身意識。他在盧氏《藝術論》小序中提挈其中《實證美學的基礎》大意：「藝術與產業之合一，理性與感情之合一，真善美之合一，戰鬥之必要，現實底的理想之必要，執著現實之必要」¹⁶³，論者指出這是魯迅在翻譯過程中被盧氏著作打動之處。¹⁶⁴盧氏在《藝術論》

¹⁵⁸ 李澤厚，《美的歷程》台北：元山書局，一九八四年，頁 25-27。

¹⁵⁹ 《集外集拾遺補編·擬播布美術意見書》，《全集》第八卷，頁 47。

¹⁶⁰ 馬里安·蓋力克，《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貢獻以及他為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現而進行的鬥爭》，韓敏中譯，樂黛雲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頁 268。

¹⁶¹ 轉引自林賢治，《人間魯迅》下冊，頁 646a。

¹⁶²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頁 218-220。

¹⁶³ 《譯文序跋集·《藝術論》（盧氏）小序》，《全集》第十卷，頁 296。

¹⁶⁴ 蓋力克，《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貢獻以及他為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現而進行的鬥爭》，《國

第一篇文章中表示，包括藝術在內的意識形態的產生，並非現實在鏡子上簡單的反映，這些反映是有它自己的或社會勢力的旗幟及標語的；在該書最後一篇中他希望「新的民眾藝術」出現，這種藝術當「竭力美化民眾的生活，描出為幸福和理想所照耀的未來，而同時也描出現在一切可憎的惡，使悲劇底的感情，爭鬥的歡喜和勝利，潑羅美修斯底欲求，頑強的高邁心和非妥協底的勇猛心，都發達起來，將人們的心，和向於超人的情熱的一般底的感情相結合——這就是藝術家的使命。」論者也謂這對魯迅具有極大吸引力。¹⁶⁵

魯迅對蘇聯的「同路人」作品特別感到親切，這與他的「中間物」思想有密切關係。「同路人」中法捷耶夫的《毀滅》被魯迅視為珍寶，他一九三一年親自譯完這部描寫共產黨遊擊隊潰敗的小說，在一九三〇年的譯者附記中提出發人深省的評論：

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這「潰滅」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實際戰鬥者獻給現代人物的大教訓。．．．即使前途終於是「死亡」，但這「死」究竟已經失了個人底的意義，和大眾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和批評家常在要求描寫美滿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見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極了，但他們也因此終於是烏托邦主義者。¹⁶⁶

我們這裡彷彿又聽到了《狂人日記》裡「救救孩子」，《熱風》中「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¹⁶⁷、「吃盡了親的死屍，貯著力量的小獅子」、「從我倒斃的所在，跨出新的腳步去」¹⁶⁸的吶喊，看到魯迅早期進化論的影子。論者指出，魯迅早期的「天才」在後期接受馬克思主義後漸為「革命」取代，¹⁶⁹在魯迅那裡，兩者都是「變」的載體，一九〇七年魯迅筆下的「性解」，就是能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群、能爭天拒俗、能「撻人」的天才，¹⁷⁰一九二七年他直接把革命等同於進化，聲稱因為無時無刻沒有革命，所以人類才得以從野蠻進步到文明，凡至今未亡的民族，其實天天都在努力革命；

外魯迅研究論集》，頁 269。

¹⁶⁵ 林賢治，《人間魯迅》下冊，頁 646a。

¹⁶⁶ 《譯文序跋集·《潰滅》第二部一至三章譯者附記》，《全集》第十卷，頁 336。

¹⁶⁷ 《熱風·隨感錄四十九》，《全集》第一卷，頁 339。

¹⁶⁸ 《熱風·隨感錄六十三《與幼者》》，《全集》第一卷，頁 362。

¹⁶⁹ 蓋力克，《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貢獻以及他為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現而進行的鬥爭》，《國外魯迅研究論集》，頁 254。

¹⁷⁰ 《墳·摩羅詩力說》，《全集》卷一，頁 68。

¹⁷¹魯迅這一觀點很像盧那卡爾斯基對真實的看法：「不了解發展過程的人永遠看不到真實，因為真實並不像它的本身，它不是停在原地不動的，真實在飛躍，真實就是發展，真實就是衝突，真實就是鬥爭，真實就是明天」。¹⁷²所謂「壯」、「死」都是「變」，也就是「真實」，而所謂「進步」、「發展」，就是「歡天喜地」（有意識地）促成這種「變」。

至此我們可以把魯迅的「中間物」概念賦予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了。魯迅與馬克思主義最引人注目的相似處，是「用生活的真實超越目的、手段的二分」。梅洛龐帝曾說：馬克思主義的精義就在於其無產階級理論，在馬克思那裡，無產階級真正體現歷史的自發性，真正「活出」哲學家腦中構思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無產階級就是「每個人都把別人當人」（recognition of man by man）而非當作「工具」，是真正的人的共存（truly human coexistence）；¹⁷³因此，「目的」與「手段」的二分法對馬克思主義言是完全陌生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一開始就不是目的的設定，而「只不過是歷史上已在運作的實踐行動、已經付諸實現的現實的延伸」（the simple extrapolation of a praxis already at work in history, of a reality that is already committed）；換言之，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接受「目的」概念，沒有馬克思主義者能「承諾」共產主義的最後階段，他們絕不把眼光固定在天堂般的未來；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目的」與「手段」是可互換的，手段也就是目的，而每一時刻都同樣不可或缺，每一時刻都像烏托邦思想的「最後時刻」一樣有價值。¹⁷⁴

魯迅之接受馬克思主義，其實是以馬克思主義印證、加強了他既有的世界觀，本文以為被印證與強化的就是主客合一的肉體生命意識，更具體的說，就是魯迅在馬克思的「階級論」那裡找到了「人所受的客觀制約是無限的，認識到這無限的制約是超越的前提」的生命態度。誥元寶認為馬克思的階級論與魯迅的人生閱歷很契合：

．．．中國傳統「知人論世」的批評意識，人到中年的豐富閱歷，使他對馬克思主義在文藝問題上的階級分析方法，尤其是客觀的社會認識原則，發生強烈認同。魯迅和當時單純從理論出發的左翼青年理論家們不同，在他，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不是先驗教條，而是印證自己多年探索的一個參照。此前，他的思想言論已經有馬克思主義因素了；此後，馬克思主義名詞術語也並未驟然增多。他當時所能接觸的眾多馬克思主義文藝家中，最能產生共鳴的還是托洛斯基的

¹⁷¹ 《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全集》第三卷，頁418。

¹⁷² 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頁55-56；引自劉再復，《魯迅美學思想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229-230。

¹⁷³ Maurice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trans., John O'Neil, Beacon Press, 1969, pp. 111-112.

¹⁷⁴ Merleau-Ponty, *Humanism and Terror*, pp. 126-128.

文學無力論（不能實用主義地過高估計文學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革命文學遲到論（真正的革命文學只有在革命成功後才有）和與此相關的在文學上尊重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同路人」思想。¹⁷⁵

還有幾位論者也注意到魯迅與馬克思的這種主客合一觀。毛澤東一九五七年說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的後期雜文帶有辯證法，一九五九年他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就合乎辯證法；¹⁷⁶王乾坤認為，魯迅與馬克思都把握住一種「道德與歷史的張力」，即不因對弱者的同情（道德）而陷於人道義憤，而將此同情從屬於科學理性，把人的自由、解放視為歷史的實踐過程，故能不一味為受苦難者控訴、歌頌勞動的美好，反而會以冷峻的態度對弱者的缺點展開批判；馬克思雖抨擊殖民主義欺凌柔弱的中國人，但也批判中國人以「天朝的盡善盡美來欺騙自己」；¹⁷⁷程致中認為，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觀條件，包括他青少年時期體會到上層社會的虛偽墮落，青年期培養出開放性的文化態度，科學的懷疑精神，以及嚴格的自我解剖；¹⁷⁸哈迎飛則認為魯迅曾研究過佛典中偏重辯證思維的華嚴、唯識二宗，為他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作了準備。¹⁷⁹

上述「階級分析」、「辯證法」、「道德與歷史的張力」及「嚴格的自我解剖」，在魯迅那裡都是數位一體，簡言之，就是魯迅所把握到的階級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主導力，來自他所察覺到的活人揮不去、斬不絕的亡者幽靈的影響。魯迅曾形容人之生活在階級社會中，有如受到地心引力吸引，要超越階級，就好比人拉著自己的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¹⁸⁰這樣的比喻可說是創見，值得細究。第三章曾提及，「大地」、「地底」、「挖底」是魯迅表現幽暗意識的意象，地底下雖埋有中國的脊梁，但更多的是鋪天蓋地的無明、愚癡、卑怯，且會時時返回地上，活人的思想、自我意識逃不出這鐵屋子般的幽靈制約。

魯迅這一「人與地心引力」關係的譬喻是符合馬克思原意的。在馬克思那裡，階級是「人的社會存在」，對人的意識有決定作用：「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

¹⁷⁵ 邵元寶，《魯迅六講》，頁 143。

¹⁷⁶ 引自易巖，《毛澤東與魯迅》，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 387-388。

¹⁷⁷ 王乾坤，《由中間尋找無限》，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 90-91。馬克思語引自《鴉片貿易史》。

¹⁷⁸ 程致中，《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主觀條件》，張杰、楊燕麗選編，《魯迅其人》，二〇〇二年，頁 459-489。

¹⁷⁹ 哈迎飛，〈以一身來擔人間苦—魯迅與佛教文化關係論之二〉，《魯迅研究月刊》，二〇〇一年第二期，頁 19。

¹⁸⁰ 《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全集》第四卷，頁 440。

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去解釋。」¹⁸¹這裡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等複雜概念，雖為魯迅視野所不及，但魯迅對階級的理解卻準確把握到那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存在」概念，魯迅以「地心」譬喻「階級」，更神來一筆地點出這社會存在的歷史、考掘學向度：「社會存在」是人的結合，「地心」則是結合了的活人所站立的已結合了的死人的總合；在馬克思那裡，階級也帶有「過去」的黑暗力量宰制的意味：迄今一切社會的歷史之所以都是階級鬥爭史，正因有史以來社會就被分成壓迫者與被壓迫者；¹⁸²這些過去的壓迫演化到資產階級社會，就是「積累起來的、過去的、物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適當的、活的勞動」，形成「資本」。¹⁸³

對魯迅來說，階級的無所不在，正像第二章提到的「種業」的「陰魂不散」，「地心」的隱喻似已預示了六十多年後德希達以「魂有論」來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幽靈」。綜合第二章、第四章的觀點，我們可推測，在魯迅那裡，「階級」與「大地」、「肉體」、「幽暗意識」、諾斯替主義式的神秘直覺，乃至導論中孟子的「氣」，都有血緣關係，亦即都是絕望／希望、墮落／超越、死／生共容的空間。魯迅的這種幽暗意識，自然使他在「接受」的同時，也以同樣的批判眼光看待馬克思階級論本身，茅盾特別注意到一九二八年魯迅希望有人譯出世上有定評的唯物史觀著作的同時，還要譯「一兩本反對的著作」。¹⁸⁴這就是誥元寶所謂魯迅是憑著「中國人傳統的知人論世的批評意識」而強烈認同階級分析的真義。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文藝觀，更與流在魯迅血液中的「文學遲到論」相通。馬克思認為藝術是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態反映之一，但藝術總是落後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藝術只有在尚未形成「藝術生產」時才能起到劃時代的作用：「當藝術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希臘神話，是希臘先民借助想像征服、支配自然力，但當這些自然力實際上被支配後，神話就自然消失了。¹⁸⁵這與上述魯迅在與創、太社進行「革命文學」論戰時多次表達的「革命文學遲到（無用、甚至不存在）」論，精

¹⁸¹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上，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 82-83。

¹⁸² 《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上，頁 250-251。

¹⁸³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上，頁 364。

¹⁸⁴ 茅盾，《魯迅—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收於《紅色光環下的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 175。

¹⁸⁵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上，頁 113。

神完全相符。

魯迅這深植於血液內的歷史唯物論文藝觀，與他「嚴格的自我解剖」又有間接但關鍵性的關係。前引誥元寶文指出，魯迅最感親近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是托洛斯基的文學無力論與革命文學遲到論，其實魯迅對中國革命的幽暗意識也與托洛斯基對蘇俄革命的反省如出一轍。魯迅看到辛亥革命後舊勢力復辟的危機，一九二七年在「革命根據地」廣州說「革命成功」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¹⁸⁶，一九三〇年「左聯」成立時說「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爲右翼作家的」（詳後），還提出「痛打落水狗」的因應對策；從托洛斯基看來，這些退潮是革命後普遍有的革命勢力退潮、反動勢力復辟的「熱月（Thermidor）現象」，就在魯迅去世的一九三六年，托氏發表《被背叛的革命》一書，指出歷史上每個革命都跟隨著反動甚至反革命，第一批犧牲者則都是革命的先鋒份子，蘇俄革命在列寧死後就是如此，布爾什維克墮落成官僚階層的極權，第一代革命元老遭到整肅，國際共產革命的理想淪喪殆盡，「真正的俄羅斯野蠻主義」復活，這是一場「被背叛的革命」；¹⁸⁷這些語言與魯迅感嘆中國之無革命，頗有相似之處。魯迅與托洛斯基的關係很微妙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他們除了文學觀相近外，都對「革命」有近乎嚴苛的反省，但魯迅卻未能用反省中國革命的嚴苛視角去臧否斯大林治下的蘇聯，這是魯迅視野的局限，而他在政治上不屑與「托派」交往，則應歸因於他晚年受中共黨員馮雪峰影響頗深有關，¹⁸⁸畢竟魯迅認同托洛斯基本人思想的言論要遠多於他拒斥托派的言論。

我們聯繫前一節所引馬克思有關兩性關係的論述，我們可以說，魯迅架通愛與死的犧牲經濟學，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認識框架，而他牢牢地植基於「死亡」的發展觀、真實觀，使馬克思主義成爲他有血有肉的肉身意識的組成部分。但是他投向的那個馬克思主義陣營，欠缺他的這一現實立足點，更多的是所謂「奉旨革命」，馬克思主義似乎是新時代的「八股」、「敲門磚」，這終於導致他最後一次從認同系統中自我放逐。

三、最後一次「背叛」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聯在上海成立，魯迅先後與「民族主義文學」、「自由

¹⁸⁶ 《而已集·黃花節雜感》，《全集》卷三，頁。

¹⁸⁷ 托洛斯基，《被背叛的革命》，簡文宜譯，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 87-108。

¹⁸⁸ 一九三六年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大眾文學」口號與「國防文學」頡頏後，托派的陳其昌曾致書魯迅，希望魯迅支持他們堅持不與國民黨妥協的立場，由於病重，只能口授馮雪峰回信，就是《且介亭雜文末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示不接受托派立場，並明確支持中共立場。見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年，頁 210-211。

人」、「第三種人」等論戰；¹⁸⁹一九三一年他的學生兼密友柔石（趙平復）被害，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的民權保障同盟同仁楊詮被刺遇害。這些是與敵對陣營的鬥爭，固然慘烈、驚心動魄，甚至威脅到他的生命，但錐心刺骨的程度，可能仍不及來自左翼友軍陣營的掣肘，即所謂「自己營壘裡的蛀蟲」、「口是心非的戰友」。魯迅與左聯間的扞格是結構性的，這些扞格有些是他與新一代革命青年的「代溝」，有些是他作為獨立知識份子與左聯濃厚的中共黨組織性格的衝突，¹⁹⁰但從他性格的深層看，實都可歸結到並表現為他性格中對既成體制、穩定現狀的懷疑這一「死亡使者」的「鬼影」。

魯迅加入左聯固仍本他十多年來培養青年作家以批判中國國民性的初衷，但他的「鬼影」一開始就在作祟。一九三〇年三月左聯成立，奉魯迅為盟主，他在成立講話中劈頭就說「『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其原因是不與實際社會接觸，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太看重知識份子的作用、以為必定會受到勞動群眾的重視，隨後針對這些可能提出匡正，即鬥爭要持久不斷、注重實力，要擴大戰線，要有共同目的；¹⁹¹這說的就是成仿吾等人，但魯迅此語一出，立刻有人表示不屑：「魯迅說的還是這些話。」¹⁹²一九三〇年三月他向章廷遷透露：「這兩年來，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所以想再來鬧他一下，順便打幾下無端咬我的傢伙。」

但他對這一「鬧」恐無法獲青年奧援，也頗了然於胸：「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失敗，或受欺，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終於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於會場中一覽了蒼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¹⁹³魯迅隨後就經驗到這失敗了。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史沫特萊為魯迅舉辦五十壽宴，魯在這場餐會上致詞稱，他在日本學醫時也翻譯托爾斯泰，他正是從托爾斯泰那裡學到社會革命的思想，他發現真正病根在貧困及無知，所以改學文藝，與封建思想鬥爭，現在有青年朋友勸他做

¹⁸⁹ 參考林賢治，《人間魯迅》下冊，安徽教育出版社，頁 725-749。

¹⁹⁰ 周行之把這兩個扞格稱為「思想差距」與「雙重領導」。當時負責左聯與魯迅聯繫的執委之一夏衍日後的回憶，說明了這兩個扞格：「（魯迅）對我們這些『左得可愛』的年青人，儘管願意聯合，但對我們的做法、作風、文風是有不少意見的。．．．在成立左聯的時候，我們服從黨的命令，與魯迅實行了聯合，並以他為左聯的領導人，但在思想上顯然與魯迅還是有差距的。」《左聯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八二年，頁 63-64；轉引自周行之，《魯迅與左聯》，頁 117-118。

¹⁹¹ 《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全集》第四卷，頁 233-237。

¹⁹² 林賢治，《人間魯迅》，頁 685。

¹⁹³ 《書信》，《300322 致章廷謙》、《300327 致章廷謙》，《全集》第十二卷，頁 5, 8。

個無產階級作家，但他不相信對工農的痛苦毫無體驗的知識青年能創作出無產階級文藝作品，創作的活力來自實踐而非理論，他勸有教養的青年去體驗工農生活，從生活中蒐集題材一面學習西方文藝理論，他將繼續努力把西方最優秀的文藝作品介紹給中國青年；餐會結束前一位青年向史沫特萊說，魯迅對無產階級文藝的態度叫人失望，使青年洩氣；但史氏表示完全同意魯迅的看法。¹⁹⁴

青年不領魯迅情與魯迅對當時青年的失望是並存的。至一九三三年中，魯迅延續《答有恆先生》時期以至「革命文學」論戰時期的觀點，認為「就是中學畢業生，或大學生，也未必看得懂《濤聲》罷，近來的學生，好像『木』的頗多了」，「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意外者。」¹⁹⁵

一九三四年起，魯迅與左聯的矛盾日漸表面化。左聯成立之初，負責聯繫左聯與魯迅的是行政書記胡風，胡風頗得魯迅信任，但與左聯其它執委尤其是黨團書記周揚意見不合，周揚有意除掉胡風；一九三四年九月，被補獲釋的盟員穆木天向左聯報告胡風是南京派來的內奸，迫胡風去職，¹⁹⁶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人即向魯迅提出胡風的問題。¹⁹⁷與此同時，周揚等人也展開對魯迅所謂「從背後給我一刀」式的打擊。以下姑舉數例。

一九三四六月，有人就上海租界工部局不准倒提雞鴨在路上走、違者罰款的規定進行抗議，聲稱西洋人優待動物甚於對待華人，魯迅就此以公汗筆名在《申報·自由談》專欄上發表《倒提》一文，認為國人應自立自強，以組織、以反抗去爭平等，不必自比雞鴨，等待外人施捨恩典；¹⁹⁸這本是魯迅向來「不要請願」、「文學無用論」、「恃力不應恃氣」思想的另一表現，不能謂不深刻且切中要害，但七月左聯成員廖沫沙化名林默寫《論「花邊文學」》一文，投書《大晚報》，說《倒提》一具有買辦意識，贊成洋人虐待華人。¹⁹⁹魯迅再度運用「順勢療法」，不但把林默文編在《倒提》後編入文集，且就將文集命名為《花邊文學》。

楊邨人公開信引起的連串事件尤令魯迅憤怒。原太陽社成員楊邨人在左聯成立後加入為盟員，一九三〇年曾為文捏造魯迅以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獎金替兒

¹⁹⁴ 史沫特萊，《憶魯迅》，收於《海外回響：國際友人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 5-6。

¹⁹⁵ 《書信》，《330603 致曹聚仁》、《330618 致曹聚仁》，《全集》第十二卷，頁 181, 185。

¹⁹⁶ 林賢治《人間魯迅》下冊，頁 856-857a；穆木天被補時間參考《全集》第六卷，頁 542 註釋 26。

¹⁹⁷ 夏衍於一九七九年對這次「四條漢子」與魯迅的會面有回憶，見房向東，《魯迅與他「罵」過的人》，頁 256。

¹⁹⁸ 《花邊文學·倒提》，《全集》第五卷，頁 490-491。

¹⁹⁹ 該文見《花邊文學·倒提》後附，見《全集》第五卷，頁 491-494。

子舉辦「湯餅會」，一九三二年進入蘇區，卻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宣布脫離共產黨，攻擊蘇區，同時在同月的《現代》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成爲所謂「第三種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楊邨人發表公開信，要求魯迅將他引爲同志，魯迅忍無可忍，發表《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斥楊，稱他爲「革命小販」；²⁰⁰魯迅此舉竟受到中共文委林伯修的抱怨，林對胡風說這會影響日後做楊邨人的工作；²⁰¹尤有甚者，楊邨人宣布脫共後撰《赤區歸來記》，發表在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社會月報》上，由於該報亦發表魯迅有關大眾語問題的《答曹聚仁先生信》，田漢竟化名紹伯，在《火炬》上投文稱：魯迅已與楊邨人「調和」了，還說這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對此魯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答「戲」週刊編者信》中抗議，他無權禁止別人把他的信件在任何刊物發表，故無所謂調和之事，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²⁰²一九三五年一月，田漢寫信給魯迅，推說「紹伯」的「調和」一文並非他所作，後經魯迅公開質問，只好承認，但其用意是激怒魯迅去攻擊楊邨人，想不到竟使魯迅轉而攻擊自己。²⁰³

魯迅畢生致力批判的就是中國人的「無特操」，此時不但被莫需有地批爲與叛徒「調和」，還是出自友軍陣營中手筆，被揭穿又沒有勇氣承擔，是可忍孰不可忍？左聯諸公的「卑怯」，魯迅當以爲足爲新舊中國的楷模罷。對此只能以「不堪」(abject)或令人作嘔的言行，魯迅只輕輕表示其憎惡和鄙視遠在明顯的敵人之上，可見其壓抑的程度。一九三五年九月他向胡風訴「苦」：「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真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²⁰⁴這儼然是又入了《野草》中「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使猛士無所用其力」的「無物之陣」，十年前「無物之物已經脫走……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的驚悚畫面，又預言般陰魂不散地回來蠱惑(haunt)他了。

²⁰⁰ 參考房向東，《魯迅與他「罵」過的人》，頁 210-214；《南腔北調集·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全集》第五卷，頁 623-632。

²⁰¹ 胡風，《魯迅先生》，《魯迅回憶錄》(散篇下)，頁 1341-1342。

²⁰² 參考周行之，《魯迅與「左聯」》，頁 106-107, 126；《且介亭雜文集》，《答「戲」週刊編者信》及《附記》，《全集》第六卷，頁 147-148, 208-210。

²⁰³ 參考周行之，《魯迅與「左聯」》，頁 128-129；《書信·350207 致曹靖華》，《全集》第十三卷，頁 47-48。

²⁰⁴ 《書信·350912 致胡風》，《全集》第十三卷，頁 211。

最後是左聯的解散與「兩個口號」的鬥爭。魯迅固然看不上左聯的領導者，但左聯對他來說可說是當時唯一有歸屬感的家；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第三國際下令中共與國民政府合作抗日，中共決定放棄無階級文學與大眾語的鬥爭，中共駐第三國際代表團並建議解散左聯。²⁰⁵魯迅身負左聯與左聯駐莫斯科代表蕭三聯絡的重任²⁰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魯迅接到蕭三傳達解散左聯建議的信後即轉交左聯，後來左聯又請茅盾通知他解散的訊息。²⁰⁷

中共決定成立「中國文藝作家協會」（文藝家協會）取代左聯，並提出「國防文學」口號。「國防文學」最早係周揚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鼓吹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周立波撰《關於「國防文學」》正式賦予內涵，聲稱將除去宗派思想，其形式內容無限多樣、無限廣闊。²⁰⁸周揚又指出，文藝作家協會將擴大範圍廣納左翼以外的各政黨文藝家，以推動文藝運動至新的階段。魯迅顯然不滿這兩個決定，遂於一九三六年四月正式回拒加入「中國文藝作家協會」²⁰⁹，並於六月由巴金等起草《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七月發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為長期綱領，以維持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主導地位，並補救暫時性的「國防文學」口號之不足。²¹⁰

左聯領袖對此進行反擊，在魯迅生命的最後階段給予沉重的打擊。新任左聯書記、也曾受魯迅提攜過的徐懋庸，於一九三六年八月致書魯迅，指責他未參加「文藝家協會」，另提口號是破壞統一戰線，他偏袒胡風是看人不準；魯迅立即要馮雪峰擬覆信，並親自補充大部分，逐條駁斥，痛斥徐懋庸等是「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並稱這樣「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²¹¹

²⁰⁵ 有關左聯解散的決定有幾說，這裡參考 Pollard, *The True Story of Lu Xun*, p. 189.

²⁰⁶ 周行之，《魯迅與「左聯」》，頁 129。

²⁰⁷ 蕭三係在莫斯科奉王明之命寫下這封信，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八日由莫斯科寄給魯迅，該信要求在組織方面取消左聯，發宣言解散，另組織廣大文學團體，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聯合戰線，見《魯迅年譜》第四冊，頁 281-283；林賢治的《人間魯迅》下冊錄有該信要點，林賢治認為魯迅曾先讀過該信，見該書頁 866-869。魯迅自己後來在答徐懋庸信中說「（左聯）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後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後者，那是潰散。」《書信·360502 致徐懋庸》，《全集》第十三卷，頁 365。Pollard 認為解散左聯是左聯領袖們請茅盾通知魯迅的，*The True Story of Lu Xun*, p. 189.

²⁰⁸ 見《魯迅論爭集》下卷，頁 1248-1250。

²⁰⁹ 即前註《360502 致徐懋庸》。

²¹⁰ 《且介亭雜文未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全集》第六卷，頁 590-591。

²¹¹ 《且介亭雜文未編·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全集》第六卷，頁 526-538。

卜立德認為，兩個口號的鬥爭是魯迅這個「不夠靈活的道德家」(inflexible moralist)與周揚等靈活的政客間的爭論。左聯這些領導人慣於簡單地接受、發布指令，所以改變立場很容易，但魯迅的信念都是他艱苦奮鬥而來，都帶有濃厚的感情在內，尤其他無法忍受與以前的敵人共事；此外，魯迅自視甚高，在他看來，要有什麼統一戰線，應該是別人投向他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旗幟。²¹²這裡所謂「艱苦奮鬥而來的信念」最應注意的是魯迅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如前所述，直到六年前「革命文學論戰」結束、左聯成立之初，魯迅都還認為當代青年寫不出無產階級文學，現在轉而支持其主導地位，這「濃厚的感情」、「艱苦奮鬥」所指為何？魯迅轉變的因素何在？林賢治認為，轉變的關鍵在一九三一年柔石被國民黨殺害，柔石等人死後，魯迅應馮雪峰請作《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者的血》，評價中國是否存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及其實績，雖然客觀上魯迅的評估仍不看好，但向他向來重視「革命人」的立場，所謂「血管裡噴出的都是血，革命人寫的都是革命文學」，故也就特別看重這次用鮮血寫成的文章，可以說是這些血寫的文章使他這一文學觀點的改變，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僅代表他個人，但此後他毅然決然正式扛下代表左聯的擔子。²¹³我們看到，魯迅的「犧牲經濟學」及「順勢療法」，再度發揮作用。

魯迅在生命末期面對這次最後的自我放逐，他終於又回到「肉體生命」這個終身的精神家園。張直心指出，《二心集》是魯迅受階級論影響最大的文集，其中雜文簡單、理性、非黑即白，但卻欠缺文學的靈氣與深度；此後他又對此蘇聯式的文論進行反省，其購讀的著作又從馬克思主義轉回他早年重視的哲人，一九三四年以後的最後三本《且介亭》雜文集對生命存在、人生意義的思索更透徹，張氏認為：

「魯迅晚年文藝思想的構成，已分不清什麼是情感、什麼是思想。它是一種哲理化了的情緒本體；或者說，是一種本能化、感官化了的思想。」張氏稱，魯迅晚年的文藝思想，更急切地呼喚「作者的心血」應與反映的對象「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面前展開」，以血性的熱情、體驗、直覺消融普羅文學口號理念的僵硬，創作應表現生命力之美，以生命力的激揚去反抗死亡、虛無、教條等一切束縛，而且對既定理論作直接閃擊，拒絕再把鮮活的人生本貌生硬地放入某種先行觀念中去闡釋。

214

隨著魯迅走到生命的盡頭，他對肉身意識、生活世界的體驗與描寫愈見純熟，愈益明顯地把他的批判事業與這肉體生命相結合。一九三四年魯迅不斷受到左聯內部暗箭所傷後嘆道：「我懂了，為什麼明末的知識份子希望亡國……」胡風說這

²¹² Pollard, *The True Story of Lu Xun*, p. 195-196.

²¹³ 林賢治，《人間魯迅》下冊，頁 876。

²¹⁴ 張直心，〈論魯迅對《二心集》型批評文體的反撥〉，收於《魯迅其書》，頁 463-465。

話說得非常沉痛；²¹⁵魯迅的身心俱疲可以想見，但他激憤地投射到「亡國」意象，卻值得探討。魯迅雖從五四以前猛抄古碑、以「唐俟」（等死）為筆名撰文起就準備迎接死亡，以後又把他所處的民國與宋末、明末國勢的不可為相比，但直到晚年他才寫了《隔膜》、《買《小學大全》記》及《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以濃墨重彩描寫清初的因言賈禍、明代肉刑的殘酷，可見他的死亡陰影已愈益擴大，愈益由個人籠罩向整個國族；但在另一方面，他也信手拈來寫下了《這也是生活》、《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等融生死於一爐的舉重若輕的文章，猶如《朝花夕拾》的延續，在個人的、國族的死亡來臨前，唱出悲欣交集的生命讚歌，這裡已沒有所謂絕望／希望、理性／感性、順從／反抗等二元對立在內，魯迅的「大心」已完全融入生活世界，「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走向他「倒斃之處」，讓他的後人由此「踏出新的腳步」。

本章小結

魯迅一生的肉體生命意識的覺醒歷程，就是以「看見死亡的黑洞」為發端，把自己從一個一個的「家」中自我放逐出去，站在黑洞邊緣用這黑暗之力去驚擾一組又一組他暫時棲身的、收容所一般的「家」，用「魂有」去搖撼「存有」的過程。魯迅首先在一九〇七年「幻燈片事件」中看到了群鬼龐然矗立在活人之上，看到人與鬼共同組成的「生活世界」，是為「與中國舊傳統決裂」的第一次放逐，提出了「立人」的母題，走進了第一個收容所「新青年」（五四同仁）；一九二四年後，他首度體驗到兩性之愛，但也正是這以「犧牲」為真諦的真愛情，使他看到五四同仁們多是依附權勢的「正人君子」，遂以怨鬼、鴟鴞自居，把自己逐出，漸漸踱進第二個收容所馬克思主義陣營；一九三〇年他在創、太社的「洗禮」後正式加入左翼陣營，但已深植生死兩界的眼光，使他看到左翼陣營不過是「奉旨革命」、依附於「心造的幻影」的溫室花朵，於是再鼓死亡黑暗的餘勇，戳穿他們的美夢，自我放逐出這第二個收容所，「回到」他真正的、永恆的家——那「黑暗，仁厚的地母」的懷抱，為他「荷戟獨彷徨」的一生，畫下痛苦但圓滿的句點。

²¹⁵ 胡風，《魯迅先生》，《魯迅回憶錄》（散篇下），頁1341-1342。